

1927年英國海軍武力進剿廣東海盜研究

應俊豪*

1925年五卅事件之後，粵英關係形同決裂，原有的共同合作剿盜模式無以為繼，但廣東海盜問題卻日益惡化，對香港往來中國各地航運路線構成嚴重威脅，是以香港總督府屢次提案應由英軍自行動武懲治廣東海盜。英國政府內部經過複雜的政策辯論與部會角力，最終在1926年底認可香港總督所提的軍事行動計畫。於是乎，英國在1927年三度動用海陸軍進剿廣東海盜。可惜此武力政策不過實行約一年多，即證明是荒誕可笑的。英國動用大批軍力，以不成比例的海軍巨艦大砲，來圍剿只有手槍與步槍的海盜，但其結果卻只換來海盜轉移陣地，廣東海盜依然繼續馳騁在南中國海上，任意劫持英國輪船、殺害英籍船員。武力政策的成效不彰，迫使英國政府只能另外尋求其他可行良策。

另外一方面，對於英國片面的軍事行動，廣州當局(國民政府)則採取相當具有彈性的雙重手法予以反制。其一是內部宣傳，將英軍懲治海盜、焚燒村落舉動貼上帝國主義暴行的標籤，並藉由渲染事件過程，刻意將其損害程度大幅提高，操作成「慘案化」，使之與反帝宣傳結合，激起百姓憤慨之心，進而為北伐行動張勢。其二則是對英交涉，表面下透過正規外交管道交涉此事，要求賠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聯絡地址：20224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No. 2, Beining Rd., Zhongzheng Dist., Keelung City 20224, Taiwan [R.O.C.])。

償道歉，但檯面下則策動小規模經濟抵制運動，形成壓力、以商逼政，藉此箝制英國的武力政策。

最後，英國的軍事報復行動爭議性極高，也牽涉到相當複雜的條約與國際法問題。雖然依據晚清以來的條約，中英雙方應共同會商處理海盜問題，但並未容許英國軍隊自行登岸剿盜；況且依據當時國際慣例，海盜罪雖為萬國公罪，但各國剿盜行動原則上還是以公海為主，並不能任意進入他國領域(領海、領土)內進行軍事行動。換言之，縱然英國是廣東海盜的受害者，但英軍三次軍事行動其實還是不免背負侵犯中國主權的質疑。

關鍵詞：廣東海盜、大亞灣、英國海軍、反帝宣傳

一、前言

美國知名語言學家與政治評論者杭士基(Noam Chomsky)在其《海盜與皇帝：真實世界中的新舊國際恐怖主義》(*Pirates and Emperors, Old and New: Internation Terroism in the Real World*)一書中，曾引述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所說的一則故事：當亞歷山大質問一個海盜為何敢在海上興風作浪時，該海盜答以「那你又怎麼有膽量在整個世界興風作浪？我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稱為海盜；你有一支海軍，所以被稱為皇帝。」¹杭士基便是以這個故事為開端，嘲諷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強權國家如何以「恐怖主義」與「反恐」的概念，來掩飾其對外的暴行。發人省思的是，透過皇帝(及其海軍)與海盜(及其小船)的對比概念，從聖奧古斯丁口中的亞歷山大與海盜，到杭士基筆下的西方強權與「所謂的」恐怖主義國家，我們可以察覺到在海軍打海盜、官兵捉強盜等看似理所當然、義所當為的概念下，其實可能隱藏著某種極度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而強權國家似乎往往利用這種權力關係，以追求公理與正義的口號，來包裝其對外的軍事征戰行動。

如果將歷史場景拉到 1920 年代的中國南方水域上，類似的戲碼同樣也在英國與中國之間開展著。強悍的廣東海盜肆無忌憚的馳騁在中國東南水域上，無視大英帝國的權威，任意劫持往來航行的英國商船、搶奪財物甚至戕害性命。英國政府乃向中國表示嚴重抗議，要求立即鎮壓海盜，維護英國商船在中國周遭水域的航行安全。為了處理日益嚴重的廣東海盜問題，香港總督、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甚至多次與廣州當局表達合作的意願，希望雙方共同出兵徹底解決位於廣東西江水域以及大亞灣沿岸的海盜巢穴。但 1925 年後，隨著五卅事件的爆發及其後的反英風潮，中英關係陷入極度緊張的狀況，雙方共同合作處理廣東海盜的計畫也就成為泡影，廣州當局對於危害英國商船的海盜事件亦多半消極以對，不願處理。因此，香

¹ 杭士基(Noam Chomsky)，李振昌譯，《海盜與皇帝——真實世界的新舊國際恐怖主義》(*Pirates and Emperors, Old and New: Internationsl Terrorism in the Real World*)(臺北：立緒文化，2004)，頁33。

港總督決定採取更為激進的手段來處理廣東海盜問題，亦即準備自行動用海軍武力，直接進剿廣東南方大亞灣沿岸的海盜據點。值此之際，廣州當局的北伐行動也如火如荼的進行，不數年已經擁有東南數省，有問鼎中原之勢。處於北伐、反英的複雜局勢下，英國究竟該如何處理廣東海盜問題？

尤其 1920 年代的中國，內部正陷於軍閥割據分裂、戰爭對峙不斷的困境裡，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既無力也無心處理海盜問題。因此，憤怒的英國人最終還是忍無可忍，痛斥中國政府放縱廣東海盜、坐觀其侵犯英船而無動於衷，故決定以暴制暴，藉口海盜乃國際公罪，無視中國領土主權，自行派遣海軍武力登上陸地去進行懲罰報復行動。

在廣州政府進剿海盜行動的承諾沒有兌現之後，我們就清楚知道廣州政府並非真的想幫助我們解決海盜問題，因此我們決定如果再發生英船遭劫事件，就要派遣一支獨立武力前往大亞灣。我們並沒有等很久。3 月 21 日，英船合生輪在從汕頭前往香港途中遭到海盜的毒手。獲知劫案消息後不久，一支英國海軍登陸武力立即被派往大亞灣，焚燬該區幾處海盜屋舍。(英國海軍情報處《每月情資報告》，1928 年 3 月。)²

於是乎在 1927 年出現一個相當不協調的歷史畫面，英國從香港大張旗鼓地派出現代化海軍艦隊，有重巡洋艦、輕巡洋艦，還有當時最新型的航空母艦與艦載機，以及船上上千名的海軍水兵與陸軍士兵，而他們要消滅的對象，竟然只是廣東大亞灣沿岸幾處村落裡大約十來名海盜，海盜的武裝力量也不過幾把步槍與手槍，以及數艘小木船！

然而，另外一方面，廣東當局卻對英軍的片面攻擊行為感到憤恨不平，痛斥為「英國帝國主義」行徑。³時至今日，事發地點的稔山(今屬惠東縣)百姓似乎仍然對此一歷史事件念念不忘、餘恨猶存，直指為英軍「侵略」行動。在 2003 年出版的《惠東縣志》即將之描述為「稔山慘案」：

1927 年 3 月 23 日，英國侵略軍「中國遠征隊」1,000 多人，乘 5 艘

²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41, CO, 129/507/3.

³ 〈政治工作人員與新聞記者聯席會議：發起反英屠殺稔山民眾示威大會〉，〈總政治部通令宣傳英兵屠殺稔山民眾案〉，《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31日，6版。

軍艦入侵稔山，在范和港登陸，還出動 4 架飛機狂轟濫炸，死傷 1,000 多人，燒毀民房 2,000 多間，製造一起轟動中外的稔山慘案。⁴

不過，事實真相究竟如何？英軍的報復行動中，燒毀的屋舍與造成死傷的情況，是否果真如《惠東縣志》所言的嚴重？抑或所謂的「慘案」，只是被宣傳出來的，而《惠東縣志》的描述，僅是承襲當時反帝宣傳的餘韻而已？

本文主旨即在探究 1920 年代北伐期間英國為解決廣東海盜問題所採行的軍事進剿行動及其後續影響。然而，必須強調的，本文不想為海盜的行為辯解，因為海盜強劫船隻殺人越貨行徑本來即應受到譴責；同時，也無意仿效杭士基以恐怖主義的認定與反恐戰爭角度來切入廣東海盜與英國海軍的報復行為，因為還原歷史場景，當時英國雖然對於廣東海盜深惡痛絕，但從未視中國是恐怖主義國家或是指控其刻意策動海盜活動，而英國對於廣東海盜採行的軍事報復行動，也只是單純希望能夠徹底解決海盜問題，抑或藉此為手段以逼迫中國當局出面處理罷了。不過，另外一方面，英國行為背後所體現的帝國主義思維及其有無成效卻是必須深入探究。亦即當英國嘗試重現 19 世紀的老方法，再以軍事手段與砲艦外交來訓誡中國人並使其符合西方標準之際，能否達到原先目的，相當值得深思與檢討。

1920 年代中英關係史研究的相關論著甚多，例如馮兆基、呂芳上、唐啟華等學者均曾對此段歷史有相當優秀且深刻的研究。⁵不過，上述論著關注的重點多在北伐前後、中國政權即將轉換之際，英國對華整體政策改變的過程與武力介入的情況。而本文則試圖以小觀大，從廣東海盜問題切入，透過北伐期間英國政府處理廣東海盜的作為，亦即英軍發動的三次軍事剿盜報復行動，來反思其背後所體現的時代意義。其次，也將深入分析國民政府方面，如何透過外交交涉與訴之輿論的雙重管道，來間接反制英國的侵略之舉。再者，英國的軍事報復行動其實爭議性極高，也牽涉到相當複

⁴ 惠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惠東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88。

⁵ Edmund S. K. Fung,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 1924-1931* (Hong Kong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呂芳上，〈北伐時期英國增兵上海與對華外交的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7 期（臺北，1997.06），頁 187-229；Chi-hua Tang, "Britain and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26-1928," (London: Ph.D. dissert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91)。

雜的條約與國際法問題。雖然依據晚清以來的條約，規定中英雙方應共同會商處理海盜問題，但並未容許英國軍隊自行登岸剿盜；況且依據當時國際慣例，海盜罪雖為萬國公罪，但各國剿盜行動原則上還是以公海為主，並不能任意進入他國領域(領海、領土)內進行軍事行動。換言之，縱然英國是廣東海盜的受害者，但英軍三次軍事行動其實還是不免背負侵害中國主權的質疑。

在資料上，本文主要將利用英國方面的檔案，例如內閣檔案(*Cabinet Paper*, CAB)、外交部檔案(*Foreign Office 371*, FO 371)、殖民部檔案(*Colonial Office 129*, CO 129)、香港政府資料(*Sessional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SP)、國會辯論檔(*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Commons*, HC Deb)等，以及中國方面的檔案，如《國民政府檔案》、《蔣中正總統文物》等，再輔以其他相關重要史料，如美、日兩國外交軍事檔案、《英文中國年鑑》、當時廣州、香港等地的中、英文報紙等來深入探究北伐期間英國進剿廣東海盜行動的過程及其所牽涉的意涵。

二、北伐、反英局勢下的中英海盜問題交涉

廣東大亞灣水域自古即為海盜猖獗之地，19世紀中期英國在香港建立殖民地以來，從香港往來中國沿海航線，也屢屢受到大亞灣海盜攻擊。在地理位置上，大亞灣位處廣東惠州西南一隅，此灣最東北角緊鄰稔山鎮，該鎮轄下范和岡(該村名稱，除范和岡外，亦有稱范和港、範和港、飯籬崗等)⁶、蟹洲、海洲三村均背山面海，村民多半以討海為生。而1920年代的惠州，在軍事、政治上呈現相當動盪的局面，備受戰火摧殘，以致民不聊生。惠州所屬的東江流域原為陳炯明麾下部隊長期控制，但歷經陳炯明叛變，以及國民革命軍數度東征，雙方軍隊彼此相互攻伐，駐軍更動、百姓徵調情況頻繁。國民黨、共產黨決裂之後，惠州南部惠陽、海豐、陸豐等地則又

⁶ 大亞灣東北角與稔山相連處的狹小水域即為范和港，岸上村落亦名范和，又稱「飯籬崗」，均為當地方言諧音，意指該村地貌形似飯籬。見廣東省惠陽地區地名委員會編，《廣東省惠陽地區名志》(惠陽：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87)，頁142與頁17、18之間所附之惠東縣地圖。

成為共黨反抗國民政府統治的重要戰場。到了 1920 年代後半期，惠州南部各處幾乎已成為農民軍(共軍)、陳炯明殘部，以及土匪各據山頭的混亂情況，而國民政府對於此處的控制力則一直相當薄弱。也因此，沿海地區例如范和岡、蟹洲、海洲等村部份百姓乃鋌而犯險，從事海盜勾當。而毗鄰大亞灣的香港，往來中國沿海各港的商船航路，則成為此批海盜覬覦的對象，受害最深。⁷

1926 年 11 月，英國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曾發文指責中國是海盜之國，廣東海盜更是其中翹楚，然而廣州當局「卻不思處理，也不願與英國海軍進行合作」；但同時卻也呼籲廣州當局反思：隨著北伐成功，廣州努力成為中國的中央政府，但如要獲得國際認同，應該要展現能力，清除廣東附近的海盜問題。⁸此則評論反映出，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順利，廣州當局即將成為中國新主人之際，廣東海盜問題已非原先地方層次、單純的粵英問題，英國的海盜因應對策必須放到更大的格局去思考，尤其需要顧及到整個中國事態的發展。

另外一方面，英國政府內部經過複雜的政策辯論與部會角力，最終在 1926 年底認可香港總督所提的軍事行動計畫。⁹是年 12 月 16 日，英國內閣「帝國國防委員會」(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se)正式決議，授權外交(駐華使

⁷ 關於 1920 年代大亞灣水域海盜問題猖獗與當地戰亂、政治社會環境變動的關係，涉及相當複雜的因素，筆者在另外一篇論文：應俊豪，〈1920 年代英國人眼中的廣東海盜問題〉，「2012 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廈門：廈門大學中文系、廈門大學國學院、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2012 年 11 月 20-21 日。已作深入探討，故此處僅簡要介紹。

⁸ 《泰晤士報》乃是在新寧輪劫案(SS *Sunning* Piracy)發生後，針對中國海盜問題所作的整體評論。1926 年 11 月，英商太古輪船公司所屬的新寧輪，在從廈門前往香港途中遭到偽裝乘客的海盜的攻擊，並企圖將之劫往廣東大亞灣水域，但因船員的奮力抵抗，海盜最後縱火燒船並乘坐小艇離去。見“Plea for Strong Action,” *The Times*, 19 November 1926.

⁹ 1926 年 6 月香港總督正式向英國政府提出武力進剿方案，但歷經約半年的政策辯論與各部會的意見協調，12 月時英國內閣才批准香港總督提案。香港總督提案，見 Governor,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30 June 1926, CAB, 24/181:0072；英國政府殖民部給香港總督的批准電文，見 Cypher 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lonies to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22 December 1926, FO, 371/11671.

領)、殖民(香港總督)、海陸軍等部會開始執行動武計畫，實程序為：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應即與廣州當局展開交涉，繼續推銷粵英合作方案，如果仍遭到拒絕，則威脅英國將自行採取獨立懲罰行動，並由香港總督與駐港海軍司令、陸軍指揮官共同準備執行計畫，並在下一次海盜劫持英輪事件發生後，即派遣軍隊登陸進剿廣東大亞灣的海盜巢穴。¹⁰

英國之所以仍不放棄粵英合作的模式，主要還是希望避免引起反英運動與破壞英國與廣州當局的關係。¹¹然而，中國局勢巨變的程度，卻超乎英國想像。廣州國民政府遷到武漢後，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支持下，開始策動新一波的反英運動，¹²同時也推動所謂的革命外交。1927年1月，在國民政府策動下，動員民眾強行進入漢口、九江英國租界，英軍為避免衝突而撤退，國民政府順勢接管租界。由於駐華海軍力量不足以收回租界，英國公使館參贊歐瑪利(Owen O'Malley)只能與國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長陳友仁交涉租界移交事宜。¹³與此同時，香港與廣州當局之間也呈現出詭譎多變的情況，廣州當局在中英邊境的沙頭角組織農民軍，有蠢蠢欲動之勢，香港總督則急調蘇格蘭邊防軍防守邊界，以防排英運動波及香港。¹⁴

在日趨緊張的中英關係之下，1927年1月27日，一艘從新加坡前往香

¹⁰ Extract from the Minutes of the 219th Meeting,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se, 16 December 1926, CAB, 24/184:0006. 關於英國政府最終決定動武的決策經過與轉折過程，因牽涉到相當複雜的部會角力與意見評估，故此處不再細述，請參見筆者另外一篇論文：應俊豪，〈亟思反制：1920年代後期英國處理廣東海盜政策之轉向〉，收入周惠民主編，《國際秩序與中國外交的形塑》(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¹¹ Report by the Chiefs of Staff, 9 December 1926, CAB, 24/184:0006.

¹² 最新一波反英運動的導火線，分別是1926年9月的萬縣事件，以及11月的天津英租界國民黨人移交案。萬縣事件肇因於英商輪船浪沈川軍木船，川軍報復強扣英船，最後演變成英國海軍砲轟萬縣的重大衝突。天津國民黨人移交案，則是天津英租界巡捕逮捕在租界活動的國民黨員，且不顧國民政府的反對，將人員移交給北京政府。這兩個事件均刺激反英輿論的滋長，也引起英國與廣州當局間的緊張。萬縣事件可以參見李健民，〈民國十五年的四川萬縣慘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臺北，1990.06)，頁387-420；天津英租界國民黨人移交案，可以參見應俊豪，〈英國與中國南北兩政府——北伐初期天津英租界國民黨人引渡案研究(1926)〉，《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12期(臺北，2007.09)，頁61-84。

¹³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頁552-553。

¹⁴ 〈港督向粵政府抗議：反對中國軍隊在英界邊境組農民軍〉，《世界日報》，1927年2月15日，3版。

港的英國商船雙美輪(SS *Seang bee*)，又遭到海盜劫持至大亞灣。¹⁵香港總督認為廣州當局的剿盜行動，「明顯是沒有效果的」，故向殖民部建議英國應堅決採取獨立的軍事行動，但卻遭到外交部的反對。因為此時國民革命軍兵鋒已指向蘇杭滬一帶，且上海也發生第一次工人暴動，列強紛紛增兵上海，擔心上海租界亦會重蹈漢口、九江覆轍。值此局勢異常緊張之際，英國外交部認為任何登陸或是燒毀海盜據點的軍事行動，將會改變世界輿論對英國的觀感，也會影響歐瑪利與陳友仁之間的談判。因此英國外交部建議目前仍應採取外交交涉或抗議模式，堅持香港在採取任何軍事行動前均須事先與駐華公使和參贊歐瑪利商議，並取得其同意。¹⁶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隨後在廣州與李濟深，公使館參贊臺客滿(Eric Teichman)則在武漢與陳友仁分別展開了交涉，但均沒有具體的結果。李濟深反指香港才是海盜的窩藏地，但允諾廣州將會在一週內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剿盜。陳友仁則在給臺客滿的照會中，駁斥英國擬派兵攻擊海盜據點的計畫，是「毫無用處的，非但不能解決公海上的海盜問題，反倒只會激怒海盜進行報復」，建議英國如要協助剿盜，不如派遣一艘砲艦堵在大亞灣入口處，以防止海盜脫逃，同時強化無線電聯繫與在港口執行嚴格的搜查，因為「海盜組織多半是在登船的港口籌畫劫掠輪船的密謀，而不是在大亞灣的聚落。」¹⁷李濟深與陳友仁口徑一致，均指海盜根據地在香港，至於海盜劫掠事件頻傳乃是由於

¹⁵ 依據該船船長陳述，海盜偽裝一般乘客在新加坡登船，途中發起攻擊，洗劫船上財物，並劫持輪船前往大亞灣。海盜最後在大亞灣附近登岸，並綁架五名乘客，以勒贖贖金。此外，根據香港警方線民事後的調查，這五名被綁架的乘客後來以6萬元的價格，在汕頭進行換贖。見“Seang Bee Returns: Piracy Problem,”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February 19 1927; Reprot by A. Reynolds, Acting Chief Detective Inspector, Hong Kong, 28 December 1927, *CO*, 129/507/3.

¹⁶ 駐華公使亦向外交部建議：「此時的行動可能會危及歐瑪利在漢口的交涉。」見British Minister to Foreign Office, 1 February 1927 & Telegram from Foreign Office, both cited from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 24/202:0024.

¹⁷ Aide-memoire from Mr. Eugene Chen to Mr. Teichman, 19 March 1927, cited from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 24/202:0024; Telegram from Mr. Eric Teichman, at Hankow, to H.M. Minister, Peking, 20 March 1927, *Sessional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1927*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SP 1927*), no. 7, 172.

英國當局與港口疏於查緝海盜組織，以及未能防範海盜挾帶武器登船所致。

其實，對英國來說，廣州當局對於英國所提進剿海盜或粵英合作的要求，一直採取敷衍的態度。1927年初，廣州當局曾大張旗鼓派出軍隊進剿大亞灣一處所謂的海盜據點。此次軍事行動最後雖然擊潰海盜，但因其頑強抵抗又擁有機關槍，故粵軍傷亡頗重。¹⁸然而，根據英國駐廣州領事的研判，粵軍的軍事行動乃是打著進剿海盜的名義，實則在肅清異己，因為粵軍攻擊對象，是一支與廣州當局為敵的軍隊。¹⁹英國海軍情報處亦痛斥廣州當局將雙美輪劫案歸咎於某位反廣州當局的將領，聲稱該將領與海盜結盟，並表示有明確證據證明海盜組織的總部設在香港。²⁰英系報紙即譏諷廣州當局的剿盜行動「與其所說是攻擊海盜，倒不如說是鎮壓叛軍。」²¹顯而易見，在英國駐華官員心目中，正忙於北伐的國民政府無意正視英國要求的海盜問題，一方面持續反對英國提供合作或自行進剿的計畫，二方面則是一再宣稱要派兵清剿，卻敷衍了事，或是反控海盜組織設在香港。至此時刻，港督、駐華公使、駐廣州總領事被迫認清到要處理海盜問題，可能僅剩英國自行出兵進剿一個選項，但關鍵還是必須顧及中國局勢的演變發展以及上海的情況。

簡單來說，1927年中國局勢的發展，實已使得英國陷入兩難的窘況。隨著北伐軍事行動進展到長江中下游，以及國民政府順勢推動的反帝民族主義運動，英國在長江流域既有的優勢地位已遭到激烈挑戰。為了確保長江中下游各口岸的安全與利益，英國在華海軍艦艇多半雲集上海，以備不時之需，但也因此使得海軍武力備多力分，原先部署在香港附近水域的海軍艦艇調度自然較為吃緊。廣東海盜則沒有浪費此良機，充分利用這段空

¹⁸ "Attack on Bias Bay: Cantonese Force Raids Chinese Pirates," *The Strait Times*, 29 January 1927.

¹⁹ 英國總領事認為被粵軍攻擊的部隊「雖然行為與海盜無異」，但並非真正的海盜，而是廣州當局的「政敵」見"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 24/202:0024.

²⁰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41, CO, 129/507/3.

²¹ "Bias Bay Captured,"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3 January 1927.

窗期，繼續肆虐於華南與香港附近水域，劫持英國船隻。²²雖然英國內閣早在 1926 年底即已對廣東海盜動武之事達成決議，然而上海形勢的演變，某種程度上牽制了海軍動向，迫使英國對廣東海盜動武一事必須持較謹慎的態度；同時，一旦對廣東海盜動武，也可能引起不可預料的反英運動，從而牽動上海形勢的發展。職是之故，廣東海盜問題遂與上海形勢演變掛上鉤，掣肘了英國政府的海盜因應方略，不敢貿然執行早先所擬定的動武計畫。

三、合生輪劫案與英國海軍第一次軍事懲罰行動

1927 年 3 月 21 日，再度傳出大亞灣海盜劫持英國商船的事件。英國怡和輪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一艘航行青島、上海、汕頭、廣州與香港等港口之間的合生輪(SS *Hopsang*)遭到海盜劫持至大亞灣。²³因合生輪為貨船(Cargo Boat)，並不適用〈防範海盜規則〉等相關規定，故船上並未配置武裝警衛。²⁴據香港警方調查，該批海盜為數約 18 名，原先計畫搶劫的對象是另外一艘輪船海寧輪(SS *Hainning*，客輪)，但該船因故並未進入汕頭港，故海盜乃轉而以合生輪為目標。他們可能是利用合生輪在汕頭起卸貨物時，趁隙偷渡上船，然後藏匿在輪船貨物之中。海盜洗劫完船上財物後，將輪船駛至大亞灣水域，再由數艘舢舨船接應登岸。在搶劫過程中，有 1 名荷蘭籍乘客受到輕傷。²⁵其次，根據合生輪船主事後指證，海盜之一

²² 英國《錫蘭時報》一則有關大亞灣海盜問題的評論，即認為上海局勢的緊張造成英國海軍無力兼顧南方水域，亦是廣東海盜繼續猖獗的主因之一。見 *Times of Ceylon*, 3 September 1927, cited from “Bias Bay: Ceylon Papers Comment on Raid,” *The China Mail*, 21 September 1927.

²³ 合生輪為怡和輪船公司所屬貨船，排水量約 2,000 多噸，主要航行於香港、廣州、汕頭、上海、青島之間運送貨物。合生號此行乃由上海出發，行經汕頭短暫停泊起卸貨物後，在前往廣州途中於大亞灣東南角的平海水域遭到偽裝乘客的海盜劫持。據合生輪買辦稱，此次被劫損失現金共計約一萬餘元，然船上貨物則未有損失。見〈合生輪船被劫〉，《工商日報》(香港)，1927 年 3 月 23 日，2-3 版。

²⁴ “Another Piracy: Jardine Cargo Steamer Seized,” *The China Mail*, 22 March 1927.

²⁵ 海盜將輪船劫持至大亞灣附近即施放來福槍以為訊號，岸上亦有同夥以槍聲回應，之後數艘舢舨船出現，靠近輪船接應海盜離去。見“Hopsang Piracy: Dutch Passenger Who Resisted, The Hai Nning Escape,” *The China Mail*, 23 March 1927.

疑似為之前 1926 年新寧輪(SS *Sunning*)劫案的慣盜，²⁶故兩案極可能為同一批海盜集團所為。²⁷

尤有要者，歷經海盜劫掠事件後，合生輪順利從大亞灣平安駛至香港，但香港警方卻在該輪船上查獲了數量龐大的走私軍火，包括 9 枝手槍、20 架李維斯機槍(Lewis machine guns)、19,800 發步槍子彈、280 發手槍子彈、25 排機槍子彈等。據查可能是引擎室的華籍員工挾帶走私上船。²⁸該批軍火以德製為主，英製、西班牙製次之，火力強大，市價高達數千元。香港警方為追查此批軍火來源，還特地扣留全船船員與買辦，後經查證，極可能是合生輪上已逃逸的火夫挾帶上船，走私的目的地應為廣州。²⁹所幸先前劫掠該輪的海盜，並未理會船上貨物，只洗劫船上船員艙、買辦艙內的財物，以及攜走了「幾袋豆子」。³⁰

合生輪劫案發生後，雖然英國殖民地部及北京公使館均以上海局勢緊張，工人發生暴動，國民革命軍也正進逼上海而來，主張先觀望上海情況再決定是否採取軍事懲罰行動；³¹但香港總督還是在 3 月 22 日下達了進攻命令，23 日清晨英國駐港海軍艦艇襲擊大亞灣稔山鎮附近的海盜據點，並

²⁶ 新寧輪為太古洋行所屬輪船，由上海經廈門前往香港途中，於 1926 年 11 月 15 日，遭到偽裝乘客的海盜劫持，隔日船員幹部乘機發動逆襲重新取回控制權，海盜則另乘小艇逃逸。“Tables Turned on Pirates: Further Details of Sunning Fight,” *The Strait Times*, 19 November 1926.

²⁷ 〈合生輪船被劫續誌〉，《工商日報》(香港)，1927 年 3 月 24 日，2 版。

²⁸ “Arms Seizure: Details of Haul on the Hopsang,” *The China Mail*, 24 March 1927.

²⁹ 合生輪原訂從汕頭啟航後，先往廣州，之後再前往香港。但因發生劫案，合生輪乃改變航線，不經廣州，直接前往香港報案。香港警方最後將此批查扣的走私軍火全數沒收充公。見〈合生輪船員尚被扣留〉、〈合生輪船被劫後之所聞〉、〈合生輪船軍火充公〉，《工商日報》(香港)，1927 年 3 月 26 日，2 版；1927 年 3 月 28 日，3 版；1927 年 3 月 31 日，2 版。

³⁰ “Hopsang Piracy: Dutch Passenger Who Resisted, The Hai Nning Escape,” *The China Mail*, 23 March 1927.

³¹ 駐華公使的態度是：「雖然他傾向採取直接行動，但還是要看上海的情況而定。」殖民地部亦認為上海的情況是首要考量，香港任何行動均應先取駐華公使的同意。見 British Minister Consular General, Shanghai, 23 March 1926 & The Colonial Office to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22 March 1927, both cited from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 24/202:0024.

派員登陸燒毀屋舍。³²

官方表示，由於最近的海盜事件，英國航空母艦 HMS *Hermes* 號，以及兩艘巡洋艦，在今天早上對大亞灣執行了軍事行動。傍晚時艦隊回到香港，行動非常成功……。此次行動乃是因為英國怡和輪船公司合生輪被海盜劫掠而決定的。³³

根據香港英文《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的報導，英國海軍總共調派五艘軍艦參與此次突襲大亞灣海盜據點的軍事行動：³⁴

表1：1927年3月英國海軍突襲大亞灣行動艦隊編組³⁵

艦名	艦型	標準排水量(噸)	編制人員
HMS <i>Frobisher</i>	重巡洋艦	9,750	690
HMS <i>Hermes</i>	航空母艦	10,950	680
HMS <i>Delhi</i>	輕巡洋艦	4,650	350
HMS <i>Marazion</i>	掃雷艦	800	74
HMS <i>Foxglove</i>	掃雷護衛艦	1,200	77

英國海軍大張旗鼓地動用航空母艦、重巡洋艦等火力強大的軍艦陣容來對付小小的大亞灣海盜據點，顯見英國海軍與香港總督對於此次進剿行動的重視。尤其此次行動中使用的航母，乃是一戰後期英國設計的新型航空母艦，1923年甫完工，可承載15架艦載機。³⁶英國動用航母的原因，可能與大亞灣水域遼闊，需要飛機勘查詳細地形與海盜聚落位置，以利軍隊登陸與作戰行動有關。³⁷其次，除了海軍艦艇外，此次行動還動用了為數約300

³² 〈獸兵出發時之耀武揚〉，《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26日，5版。

³³ “Action against Chinese Pirates: British Expedition to Bias Bay,” *The Times*, 24 March 1927.

³⁴ “Bias Bay Evil: British Navy Takes Drastic Action,” *The China Mail*, 24 March 1927.

³⁵ Parkes O. and Maurice Prendergast ed., *Jane's Fighting Ships*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1919), 75, 77, 123, 133, 135.

(http://freepages.genealogy.rootsweb.ancestry.com/~pbtjc/Janes_1919/Index.html) (Online Data)

³⁶ 關於HMS *Hermes*，可以參見海軍史網站：

<http://www.naval-history.net/xGM-Chrono-04CV-Hermes.htm>(資料擷取時間：2010年8月31日)

³⁷ 《德臣西報》即稱「整個行動過程中，HMS *Hermes*的艦載飛機都在上空觀察並報告

名的陸戰隊，負責登陸作戰。英國海軍艦隊在3月23日凌晨駛抵大亞灣范和港附近水域後，因受制於水位淺，艦隊乃停泊警戒，陸戰隊(港警隨行)則乘坐17艘小艇，兵分三路登岸進行摧毀海盜村落作戰。³⁸英軍在登岸前，首先以機關槍對空鳴槍，藉以示威同時警告百姓，登岸後再由通曉「客籍語言」的華籍警探、通事等，向居民宣告行動目的，「勸諭各戶，令於最短速時間從速搬出」，「英兵亦將各人驅逐」。待居民全數撤出後，英軍「乃先以茅草，繼以炸藥，盡將賊巢焚燬，該處所有漁拖大眼雞船，一律焚燬。」³⁹總計此次行動，龜洲、蟹洲、海洲三村屋舍，除廟堂保留不燒外，其餘房屋多數盡遭到英軍焚燬，毀損屋舍近百間(龜洲、蟹洲兩村屋舍被毀約30間、海洲屋舍約50-60餘間)，燒毀船隻約27艘(小船20艘、大船7艘)。⁴⁰英軍在撤退前並到處張貼(發送)中文布告，解釋此次行動來由：「大英政府示：此次科罰該村，乃因該處鄰近居民，迭次劫掠英國商船之故，嗣後如該處鄰近居民再有劫船隻事情，當必亦照懲罰。」⁴¹簡言之，英軍行動程序為：先鳴槍示警，繼以口頭勸導、武力驅散，最後再炸毀民居與焚燒船隻。《廣州民國日報》亦稱英國海軍在香港警司、副警司、偵緝處長、華人探長與通事等人員陪同下，兵分三路，從惠陽稔山鎮的海洲、龜洲、蟹洲登岸，並在驅趕當地民眾離開後，縱火燒屋。⁴²(英國海軍第一次軍事懲罰行動可以參見圖1)

情況。」香港《工商日報》亦稱英軍進行登陸行動時，「同時以飛機在空中窺探一切」。見“Bias Bay Evil: British Navy Takes Drastic Action,” *The China Mail*, 24 March 1927；〈英水兵痛剿大亞灣海盜〉，《工商日報》(香港)，1927年3月25日，3版。

³⁸ “Bias Bay Evil: British Navy Takes Drastic Action,” *The China Mail*, 24 March 1927.

³⁹ 隨行港警由香港警察司胡崇甫(E. D. C. Wolfe)率領，除英籍探目外，尚有華探幫辦1名、華籍探目4名、通事2名，其中華籍幫辦、探目與通事等人「皆善操客籍語言」，「因大鵬灣即大亞灣附近村落，皆客籍人故也。」〈英水兵痛剿大亞灣海盜〉，香港《工商日報》，1927年3月25日，3版。

⁴⁰ 〈英水兵痛剿大亞灣海盜〉，香港《工商日報》，1927年3月25日，3版。不過，根據日本海軍軍令部統計資料，英國海軍此次行動共燒毀民屋140戶、戎克船40艘，見日本海軍軍令部編，〈支那ニ於ケル海賊被害狀況一覽〉(大正10年以降昭和4年9月末調)，《軍令部常報第28號》，國情第6號，1929年10月25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二卷，F-0139/0298-0304。

⁴¹ 「英艦佈告一紙」，〈廣東省政府呈英國軍艦及飛機到惠陽縣屬稔山海面焚屋殺人造成慘案請嚴重交涉〉，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1927年10月21日，典藏號001070553005。

⁴² 〈獸兵登陸時之情形〉、〈施行大屠殺之慘狀〉，《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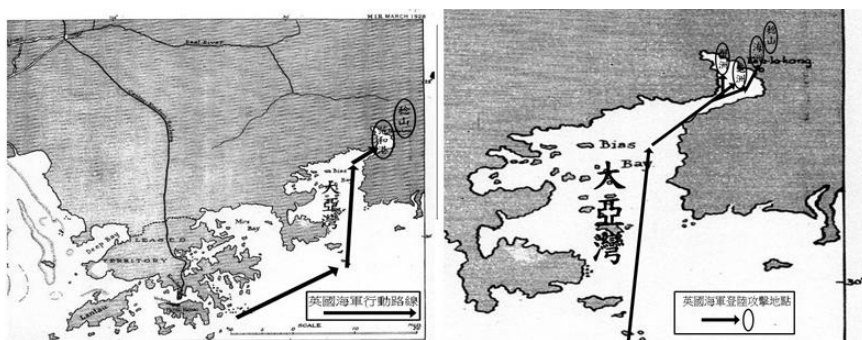


圖1：1927年3月英國海軍第一次軍事懲罰行動圖(登陸進剿大亞灣海盜)

圖片來源：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CO, 129/507/3.

由上述英軍登陸後的行動過程來看，此次行動顯然屬於無差別掃蕩作戰。因為行動中雖然盡量避免傷害人命，但現實情況不可能分辨海盜與良民，亦無法確認海盜真正居所與船隻，故只能將大亞灣龜洲、蟹洲、海洲三村全數視為海盜據點，所有屋舍、船隻則不分青紅皂白一律焚燬。

此次行動有雙重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在不傷害人命的前提下，盡可能摧毀所有已知的海盜村落。第二個目標，則是摧毀海盜村落附近所有的木船及其他船隻。⁴³

因此，不難看出英國海軍一方面試圖在技術上消除海盜生存條件，即透過摧毀居所與行船工具，淨空大亞灣沿海村落，從而拔除海盜賴以維生的社會根基，二方面則從心理上產生威嚇作用著手，即藉由無差別行動，大肆破壞，以及廣貼懲罰布告，藉此宣示英國嚴懲海盜與報復的決心，讓當地百姓心生畏懼，進而達到嚇阻海盜劫掠英船的目的。

此外，軍事行動中英國竟然動用航空母艦與巡洋艦來懲罰大亞灣海盜，可見香港總督府對於廣東海盜問題的深惡痛絕。香港英文《德臣西報》即痛斥廣州當局的毫不作為：

日，5版。

⁴³ “Bias Bay Evil: British Navy Takes Drastic Action,” *The China Mail*, 24 March 1927. 上海《申報》也援引路透社香港消息，稱英軍此次進剿海盜之目的有二：「一、毀群盜聚集之二村，而不傷害生命；二、毀灣中之小舟。」見〈香港英海軍痛剿海盜記〉，《申報》(上海)，1927年3月25日，6版。

香港政府多次嘗試與廣州政府合作處理大亞灣海盜問題。然而，廣州政府雖一再重申做好進剿準備，但事實上卻毫無真正的行動。廣州政府所做的唯一行動，只是趕走這個區域的政敵……。廣州政府從未致力於鎮壓大亞灣的海盜，無論是派兵進剿海盜村落，或是在該區駐紮軍隊以維持秩序，防止海盜攜帶劫掠品登岸。⁴⁴

香港《工商日報》亦引某西文報稱此次軍事行動肇因於廣州當局不願與英國合力剿匪，在海盜屢次劫掠英船、「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香港政府只能「單獨為之」。

本港船隻屢被大亞灣之海盜劫掠，上星期……合生輪又復被劫，本港當道忍無可忍，乃命科比沙號、靴美士號、達賴號、馬拉辰號、反霍士格立號五艘軍艦前往該處剿匪……。事前港政府嘗請（廣東）省政府合力剿匪，但省政府始終不能照辦，為保護行旅起見，港政府不能不單獨為之。⁴⁵

路透社則從倫敦探詢英國政府此次軍事進剿行動背後的動機，亦指稱因廣州當局在反英風潮後，未能有效處理廣東海盜問題，嚴重危害到英人生命財產安全，故必須予以反制：

路透社探悉（英國）政府現考慮香港附近之海盜問題，因粵當道雖迭經抗議，迄未能有切責行動也，自排貨風潮後，廣州海盜增多，為生命財產之大患，故必設法應付之。⁴⁶

不過，此軍事行動卻引起國民政府的強烈不滿，武漢當局與廣州當局分別向英國使領官員提出嚴正抗議，痛斥此次軍事行動侵害了中國的領土主權，要求香港政府道歉，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事情。但英國方面堅稱只有國民政府確實解決海盜問題，英國海軍才會停止採取類似鎮壓海盜的行動。⁴⁷

⁴⁴ “Bias Bay Evil: British Navy Takes Drastic Action,” *The China Mail*, 24 March 1927.

⁴⁵ 〈英水兵痛剿大亞灣海盜〉，《工商日報》（香港），1927年3月25日，第3張。

⁴⁶ 「路透社（3月）23日倫敦電」，見〈香港英海軍痛剿海盜記〉，《申報》（上海），1927年3月25日，6版。

⁴⁷ 廣州當局是在3月26日向英國總領事提出抗議，武漢當局則是由陳友仁在4月5日向英國公使館參贊臺客滿（Eric Teichman）提出抗議。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四、英國海軍後續的軍事懲罰行動

香港總督對於海盜問題的處理態度相當明確，即是以戰逼「合」，藉由採取獨立的軍事行動，迫使國民政府同意與英國一同合作進剿海盜。1927年4月，香港總督任命的「新寧輪劫案調查委員會」(‘Sunning’ Piracy Commission)針對海盜事件原因與因應對策做出了報告，同樣也聲言支持港督的武力進攻計畫。該委員會認為英國政府應向廣州當局持續施壓，以推動粵英合作進剿海盜；但如果遭到拒絕，「英國將有充分的理由採取獨立行動，消滅惡名昭彰的海盜巢穴。」⁴⁸

1927年5月6日發生豐富輪(SS *Feng Fu*，原中文船名不詳，此處為音譯)被大亞灣海盜劫持事件後，雖然豐富輪乃華籍輪船與英國無關，⁴⁹但香港總督還是透過廣州總領事，再次提醒廣州當局：

豐富輪劫案證明大亞灣海盜依然活躍……如果中國當局仍然拒絕英國的合作，卻又無法自行解決大亞灣海盜問題的話，只要再有英國船隻遭到海盜劫持，英國海軍將會採取獨立的報復行動，進剿大亞灣海盜。英國政府決不再容許大亞灣海盜劫持英國船隻而無庸付出代價。⁵⁰

7月20日，又發生挪威籍輪船索爾維肯輪劫案(SS *Solviken* Piracy，原中文船名不詳，此處為音譯)，香港總督依然透過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向國民政府發出「警告」：希望國民政府接受粵英合作剿盜的方案，否則如再有英商輪船遭劫，英國將再度自行採取軍事懲罰行動。⁵¹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 24/202:0024.

⁴⁸ Report of the Sunning Piracy Commission, 19 April 1927, *SP 1927*, no. 3, 57-69.

⁴⁹ 根據英商太古輪船公司Anking號船長的報告，Feng Fu號輪船是在從廣州前往上海途中遭到偽裝乘客的海盜攻擊。海盜洗劫乘客財物(價值約10,000元)後，將輪船劫持至大亞灣附近，轉乘前來接應的船隻登岸離去。見Telegram from Butterfield and Swire S.S. Anking at Amoy (Captain Scott), 9 May 1927, *SP 1927*, no. 7, 173.

⁵⁰ Despatch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H.M. Consul-General, Canton, 11 May 1927; Note from H.M.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Canton, 12 May 1927, *SP 1927*, no. 7, 172-174.

⁵¹ 索爾維肯號是挪威籍輪船，從香港出發預計前往西貢，但在航行途中遭到偽裝乘

(一) 日陞輪劫案(SS *Yatshin* Piracy)與第二次軍事懲罰行動

1927年8月30日，又發生一件英船遭劫案件：英國怡和輪船公司所屬，原定香港出發，經由汕頭駛往上海的日陞號輪船，在離開汕頭後不久，即遭到18名偽裝乘客的海盜劫持。在日陞號在出航前，香港警察當局即已事前接獲重要情資，警告有海盜集團準備在汕頭登船劫持該輪。故日陞號船長與船員幹部也對從汕頭登船的旅客及行李進行搜查，但最終還是未能阻止海盜事件的發生。主要原因似與港口與輪船檢查制度的重大缺漏有關：部分船員有時賺取外快，常將個人所屬艙房空間私自租與乘客，導致查緝人員無從掌握船員艙房內的海盜行蹤。日陞號輪船劫案的海盜即是藏匿於此類船員艙房內，待輪船航行出海後，再持槍械發動突擊，挾持船長幹部，並控制輪船。海盜得手後隨即將船上乘客財物洗劫一空，並強迫日陞號輪船改駛至廣東大亞灣，挾帶7名華籍乘客與掠奪品登岸。海盜離開日陞號後，因為又有不明快艇靠近輪船，為避免遭到其他海盜第二次的洗劫，日陞輪乃改變行程加快駛往香港求援。⁵²

早在1927年7、8月間，英國駐華公使、廣州總領事、香港總督以及海軍司令等已經針對懲罰行動達成共識，一旦再發生海盜襲擊英船事件，駐港海軍將可立刻採取軍事行動進攻海盜據點。⁵³所以當日陞號海盜事件發生後，英國海軍隨即在9月1日凌晨展開大規模的報復行動，摧毀大亞灣兩個海盜村落，同時燒毀港口內的船隻。類似1927年3月的第一次懲罰行

客的海盜劫持至大亞灣。海盜襲擊過程中，造成外籍船長身受重傷，二副與無線電操作員亦遭到槍擊。Despatch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H.M. Consul-General, Canton, 21 July 1927; Letter from H.M.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Canton, 25 July 1927, *SP* 1927, no. 7, 179-180.

⁵² 海盜在離船前，還特別警告日陞輪船長必須立刻駛離，否則將會有其他海盜集團意圖染指。見“Yatshing Piracy: Passengers Treated with Consideration,” *The China Mail*, 2 September 1927; 〈日陞輪被海盜騎劫詳情〉，《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2日，第2張第2頁。

⁵³ 1927年7-8月間，英國駐華公使、廣州總領事、香港總督以及海軍司令之間彼此往來電文，均強調一旦發生海盜劫持英船事件，海軍即可採取行動進行報復。見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 24/202:0024.

動，英國海軍仍舊派遣由 5 艘軍艦組成任務艦隊，其中有 2 艘航空母艦、1 艘輕巡洋艦、1 艘驅逐艦與 1 艘護衛艦；預備登陸作戰的士兵人數則約 500 名，並由香港警察司胡樂甫、副警司京氏率領 18 名香港警探隨行，英國海軍航空母艦亦派出飛機在大亞灣上空偵察。⁵⁴

表2：1927年9月英國海軍突襲大亞灣行動艦隊編組⁵⁵

艦名	艦型	標準排水量(噸)	編制人員
HMS <i>Argus</i>	航空母艦	15,775	495
HMS <i>Hermes</i>	航空母艦	10,950	680
HMS <i>Danae</i>	輕巡洋艦	4,650	350
HMS <i>Sirdar</i>	驅逐艦	1,075	90
HMS <i>Foxglove</i>	掃雷護衛艦	1,200	77

英國海軍此次行動目標為位於大亞灣東北角，稔山鎮兩個知名的海盜聚落：長排與范和港。當英軍快艇靠近，原先停靠岸邊的多數木船即紛紛快速駛離以避戰禍，僅有 10 艘木船因未及駛離而慘遭到英軍焚燬。英軍從海洲登岸後，立刻進入長排村搜查海盜屋舍，似因該村居民拒絕透露海盜屋舍的確切所在，登陸部隊乃焚燬其中約 40 間屋舍作為報復與警告手段，直至村中耆老出面指出海盜屋舍所在後方始罷手。不過，為了避免在當地引起麻煩，英軍在進行焚燬行動時，特意避免波及到宗祠廟宇等建築物，並事先將屋舍內的牲畜移出。完成長排村的焚燬工作後，英軍隨後趕往范和村，準備突擊另一處海盜據點，該村耆老聞訊立刻告以海盜屋舍的確切所在。但英軍到達時，該海盜似已在先前與他人鬥毆而死，故英軍遂將 5 間海盜屋舍盡行焚燬，並未波及到其他無辜村民房舍。最後，英軍離開前，還是一如前例，在村莊廣發告示，再次警告如有劫掠英船事件發生，英軍仍將重返報復。(英國海軍第二次報復行動參見圖 2)⁵⁶

⁵⁴ “Bias Bay Raid: Five British Warships Take Part in Demonstration,” *The China Mail*, 2 September 1927.

⁵⁵ Parkes O. and Maurice Prendergast ed., *Jane's Fighting Ships*, 75, 103, 123, 128, 133.

⁵⁶ “The Yashing Piracy,” 1 September 1927, H. G. 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 Book*, 1928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12-1939), 696-698. 不過，依據《香港華字日報》的報導，英軍部隊在進入長排村後，村民皆早已聞風逃離，英軍隨即逕行縱火燒村，待燒毀約40間房舍後，才有該村耆老數名出面與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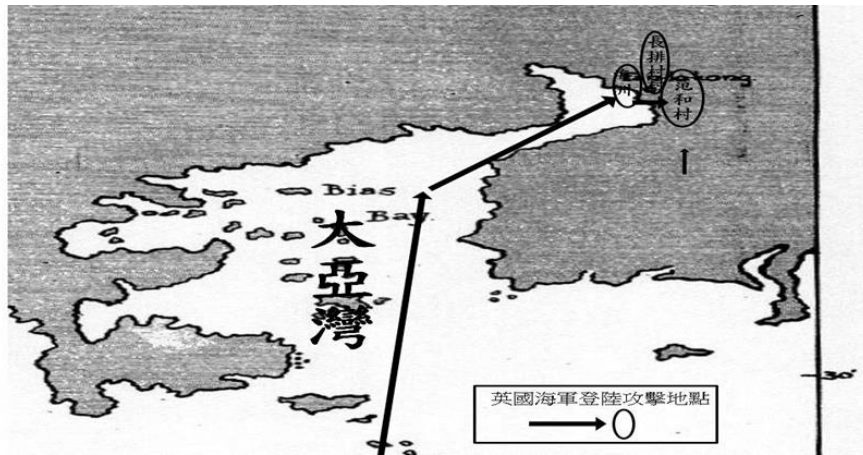


圖2：1927年9月英國海軍第二次軍事懲罰行動圖(登陸進剿大亞灣海盜)

圖片來源：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CO, 129/507/3.

雖然突擊行動前，香港當局已決定第二次登陸作戰不再採取第一次的無差別掃蕩作戰，而是只燒毀「確定是海盜所有的屋舍」，其目的在於分化當地，鼓勵其供出海盜行蹤。⁵⁷然而，由上述過程可以清楚得知，英軍為了報復長排村民的不合作態度，最終還是進行了某種程度的無差別掃蕩作戰。其次，由稔山鎮海洲、長排、范和等村居民的反應來看，英軍的無差別報復行動也確實已經發揮一定的作用，村中耆老似已逐漸默認並消極接受英軍行動，多半只能被迫出面幫英軍帶路、指出海盜屋舍所在，以免殃及其他村人屋宅。例如根據《香港華字日報》的報導，當英軍登陸海洲時，

軍會晤並清楚告以海盜屋舍(5間)所在，英軍乃再安裝炸藥將其焚燬。換言之，在英軍焚燬的45間房舍中，僅有5間確認為海盜屋舍，其他40間均為無辜村民所有。見〈英軍警會剿大鵬灣海賊〉，《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3日，第2張第3頁。上海《申報》引述路透社香港電的消息，亦有類似報導，指稱英軍先故意縱火燒村，以脅迫村民供出海盜嫌疑犯的住所。見〈英海軍焚燬盜村〉，《申報》(上海)，1927年9月3日，7版。

⁵⁷ 第二次登陸作戰已不再採取第一次的無差別掃蕩作戰，而是只燒毀「確定是海盜所有的屋舍」，其目的在於分化當地居民，鼓勵其供出海盜行蹤。據香港總督事後的報告，「村民對此表達感謝之意」。見Minutes of A Meeting to Discuss Anti-Piracy Measures, held at the Japanese Legation at 11:00 A.M., 16 November 192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一卷，F-0138/0180-0183。

「村耆出見海軍，力言海賊不在該村，並願指示賊黨匿跡之所」；而在英軍開始在長排村縱火焚燬屋舍後，「隨有村耆數名，出晤軍警，願指示海賊寓所」；至於范和港，則是英軍初到，「村耆亦允指示日陞輪劫案有關之著名賊屋」。⁵⁸稔山各村耆老為免英軍報復行動與屋舍焚燬之災，只能選擇將海盜據點供出。

(二) 高州輪劫案(SS Kochow Piracy)與第三次軍事懲罰行動

正當英國海軍在大亞灣進行軍事懲罰行動之際，在廣東西江水域又發生另外一起嚴重的海盜劫持英船事件。1927年9月1日，高州輪⁵⁹由香港出發循西江水域前往梧州途中，在三水附近遭到海盜的劫持。輪船上雖然配置有印度籍的武裝警衛(Indian Guards)，但卻被海盜制服。船上的英籍輪機長因試圖用手槍反擊，慘遭海盜開槍擊中頭部，並棄屍江中。該批海盜們並宣稱之前的挪威籍索爾維肯號輪船被劫事件亦是他們所為，此次劫持高州輪更是策劃已久，先前已多次嘗試動手，惜因未有適當機會而作罷。海盜最後將高州輪押往太平(Tapinghu)與石岐一帶，攜帶贓物分乘小艇與舢舨登岸逃逸。高州輪的買辦及其屬下與部份乘客亦被海盜當作人質擄走。⁶⁰

早在高州輪劫案發生之前，香港警察當局即已接獲情資，有海盜計畫劫持香港經西江往來梧州之間的輪船航班。而劫持高州輪的搶匪，據悉乃是西江水域太平附近有名的海盜集團。此類盜匪以往素靠向往來航行的船隻強迫勒索通行費為生，但因西江水域沿岸海盜集團甚多且需索無度，輪船公司在忍無可忍、繳無可繳的情況下於是拒絕再繳納通行費。西江水域各海盜集團乃展開報復行動，除於1927年8月左右開始即肆意開槍轟擊航行經過的輪船以為示威手段外，更派出海盜假扮乘客窺伺輪船航班與上下

⁵⁸ 〈英軍警會剿大鵬灣海賊〉，《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3日，第2張第3頁。

⁵⁹ 根據英國駐華使館的資料，該船為懸掛英旗的輪船，但船東為華人。《香港華字日報》則稱高州輪為香港泉利公司所屬產業，見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 24/202:0024；〈高州輪被劫之港訊〉，《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3日，第2張第2頁。

⁶⁰ “The Kochow Piracy,” 1 September 1927, *The China Year Book*, 1928, 698-699.

客貨情形，準備直接動手劫持輪船。輪船公司為免遭受劫難，只能採行聯航策略因應，即多艘輪船組成船團一起航行，並在船上配置足夠的武裝警衛，防止海盜生事。同時，英國海軍派駐在西江的船艦也強化在該水域的巡邏任務，以確保往來香港與梧州船隻的安全。⁶¹但很明顯的，船商與英國海軍的防護行動，僅能一時嚇止海盜，只要稍有疏漏不察之處，海盜即趁虛而入劫持輪船。

獲悉高州輪劫案後，有鑑於中國當局無所作為，英國海軍立刻決定採行另外一次軍事懲罰行動，西江分遣艦隊(West River Flotilla)派出飛蛾號(HMS *Moth*)、秋蟬號(HMS *Cicala*)、松雞號(HMS *Moorhen*)等三艘砲艦，在艦隊指揮官統率下趕往西江水域。

表3：1927年9月英國海軍突襲西江水域艦隊編組⁶²

艦名	艦型	標準排水量(噸)	編制人員
HMS <i>Moth</i>	昆蟲級砲艦	645	53
HMS <i>Cicala</i>	昆蟲級砲艦	645	53
HMS <i>Moorhen</i>	內河砲艦	165	31-37

到達西江水域後，英國海軍先派遣陸戰隊登上太平，將居民驅離後，縱火焚燬沿岸一帶的房舍。接著三艘砲艦再駛往石岐附近，因該地亦為海盜活動區域，英國海軍在警告百姓撤離後，對城鎮施行砲擊，共計發射 18 枚砲彈。此次軍事懲罰行動後，英國當局對外正式公發佈告如下：

英國海軍西江分遣艦隊在太平、石岐進行了一次軍事行動。太平乃是海盜出入的村落，因此在警告驅離百姓後將沿岸屋舍焚燬。石岐則是海盜登陸的村落，故在驅離百姓後，發射 18 枚砲彈轟擊村落。行動中，英國方面無人死傷，中國方面相信亦無人員傷亡。據報廣州軍隊正在調往該地進剿海盜。⁶³

⁶¹ 〈高州輪被劫情形續詳〉，《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5日，第2張第2頁。

⁶²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36-37, CO, 129/507/3. 至於砲艦相關數據，則見Parkes O. and Maurice Prendergast ed., *Jane's Fighting Ships*, 93-94.

⁶³ "British Naval Raid," *The China Year Book*, 1928, 699.

香港英文《士蔑西報》(*The Hong Kong Telegraph*)事後亦引據官方正式報告，稱高州輪劫案中有英籍輪機長遇害，而太平、石岐「兩村窩藏海賊，人所共知」，太平之「海賊」更與「西江各輪三次劫案有關」，故英國海軍乃決定對之施行「懲戒海盜辦法」，派艦縱火與砲轟以「懲治劫匪」。⁶⁴簡言之，英國海軍此次行動比諸前兩次又愈見激烈，雖然行動本身並未造成百姓死傷，但除了縱火焚燒屋舍外，甚至還動用殺傷力極大的艦砲轟擊城鎮，藉此威嚇地方百姓的意味也更加濃厚。⁶⁵(英國海軍第三次報復行動參見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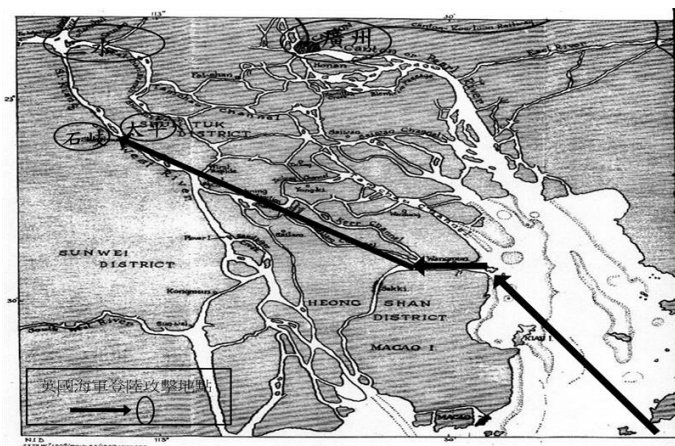


圖3：1927年9月英國海軍第三次軍事懲罰行動圖(進剿西江海盜)

圖片來源：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 106, 15 March 1928, CO, 129/507/3.

其次，高州輪劫案發生後，一時之間風聲鶴唳，香港往來梧州、江門等航線輪船公司紛紛自危，除強化自身防禦能力外，也尋求香港與海軍當局的保護：

自來往港梧(香港梧州線)之高州輪船在太平沙被海盜行劫後，一般港梧船紛紛設法防禦，而往來港江(香港江門線)輪船見此，亦恐有不測，

⁶⁴ 《士蔑西報》關於英艦攻擊行動的報導，轉引自〈英艦焚燬賊村房屋〉，《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6日，第2張第2頁。

⁶⁵ 英艦砲擊太平等「賊巢」後，隔日一艘輪船航經該處，仍見「茅寮餘火未熄」，不過據查太平一地並「無多屋宇，祇隔若干地方則有茅寮三數間而已。」見〈英艦砲擊賊巢〉，《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5日，第2張第2頁。

大利、安利兩輪且實行裝置無線電，並派人請求港政府派艦保護。現據某船東述稱，政府現已加派淺水艦，沿途保護，故每日港江輪來往，至少有三艘兵艦相迎，或出現於東西馬寧灣泊，或停在鶯哥嘴一帶海面，且有時沿途保護至江門北街而後已。(廣東)省政府亦有兵艦加派，停碇北街海面，如聞不測事件發生，即適時開往救援……。⁶⁶

歷經高州輪劫案以及英國海軍的報復行動，面對無以復加的海盜劫掠事件，香港總督府也只能消極地協調英國海軍與廣州當局提供更多的保護。

五、廣州當局(國民政府)的反制之道： 輿論宣傳與外交交涉同時並進

1927年3月23日英國逕自派遣陸海(空)軍登岸進剿海盜聚落後，因英軍行動屬於突擊性質，即凌晨發動登陸行動，迅速驅趕村民、焚燒村落、船隻，行動完成後則隨即撤回所有兵力；因此，雖然國民政府在稔山鎮附近的惠陽縣駐有軍隊，但並未在第一時間察覺英軍行動。換言之，英軍的登陸報復行動，並未與附近駐防粵軍發生直接衝突。事實上，這也是英軍原先規劃報復行動的主要原則，亦即發動突擊、事畢即撤，避免與粵軍正面衝突。⁶⁷

然而，當上述行動逐漸傳開之後，廣東局勢即陷入相當緊張的情況。⁶⁸駐守惠陽的第18師隨即電報英軍的「焚殺」行動，據該師政治部主任黃鳴

⁶⁶ 〈港江航線加艦保護〉，《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9日，第2張第2頁。

⁶⁷ 海陸聯合突擊行動計畫乃是由香港總督府委請駐港陸軍總指揮官所擬定，整個軍事行動以24小時內完成為限。關於突擊行動計畫細節，可以參看由香港總督府提交給英國政府參謀首長會議的報告。見Report by the Chiefs of Staff, 9 December 1926, CAB, 24/184:0006.

⁶⁸ 例如為了擔心遭到反英(外)暴動的波及，美國駐廣州總領事即下令廣州附近所有美國人應儘速撤到香港。總領事認為英國的進攻行動雖然尚未引起動亂，但已造成廣州當局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裂，美國教會創立的嶺南學校(Canton Christian College)部份職員也已開始罷工。見The Minister in China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8 March 1927, FRUS, 1927, vol. 2, 269.

一給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留守主任孫炳文的電文中，即稱「英兵二百餘人在惠陽屬稔山殺村民二千餘家、死千餘人，情形嚴重，現正謀對付。」⁶⁹廣州當局獲悉後反應異常激烈，展開一系列反帝宣傳攻勢。總政治部留守主任孫炳文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宣示英帝國主義者焚殺之罪惡」、「喚起全國民眾對付香港英帝國主義」，稍後並舉辦政工人員與新聞記者聯席會議，發動輿論宣傳抨擊英國帝國主義。總政部亦通令各級政治部「對於此案努力宣傳，及蒐集資料供各報發表。」⁷⁰廣州當局機關報《廣州民國日報》將此事定調為英國帝國主義者為干涉北伐行動而施行的砲艦政策與屠殺行為：

英帝國主義者……欲實行其武力干涉中國政策……(見革命軍克復上海)香港英帝國主義者以在滬殺計不得逞，乃……改變方針，轉向吾粵之惠陽縣屬、毗連香港之稔山地方一帶施行大屠殺，用飛機四架、砲艦數艘、獸兵數百……借剿匪為名……水路航空同時並舉，將該處……十餘村落全數焚劫，焚燒村戶二千餘家、死亡千餘人。⁷¹

孫炳文在給蔣中正報告中，亦引據報載稱「英兵三百餘人……在惠陽屬之毗連香港之稔山地方焚殺村戶二千餘家、死六千餘人，情勢嚴重，此間各界已謀應付。」⁷²換言之，廣州當局及其輿論機關試圖將英國懲罰海盜的軍事行動複雜化，將其納入北伐大革命的時代背景中，渲染成英國為阻礙北伐，故意在革命根據地與後方的廣東省策動惠陽屠殺。⁷³為了達到上述目

⁶⁹ 〈黃鳴一電孫炳文轉蔣中正英兵二百餘人在會楊社山殺村戶二千餘家情形嚴重正謀對付(1927年3月2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11003。

⁷⁰ 〈十八師政治部之電報〉、〈總政治部之緊急會議〉、〈總政部今日招待新聞記者：討論英人又在惠陽慘殺案〉、〈政治工作人員與新聞記者聯席會議：發起反英屠殺稔山民眾示威大會〉、〈總政治部通令宣傳英兵屠殺稔山民眾案〉，《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26日，5版、9版；1927年3月28日，4版；1927年3月31日，6版。

⁷¹ 〈香港英帝國主義水兵及飛機在惠陽屬稔山地方大施屠殺〉，《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26日，5版。

⁷² 〈黃鳴一電孫炳文轉蔣中正英兵二百餘人在會楊社山殺村戶二千餘家情形嚴重正謀對付(1927年3月2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11003。3月28日，孫炳文又將英軍出兵稔山一案通電給各重要軍、政、黨等單位，見〈孫炳文等電蔣中正陳友仁等據報英派飛機士兵於稔山地區焚殺村民情勢危急已謀應付中(1927年3月2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12023。

⁷³ 另一篇社論即稱「惠陽的大屠殺，是英帝國主義搗亂革命勢力的狡猾陰謀的一貫政策」，見趙慕儒，〈社論：我們要認識英帝國主義的屠殺政策〉，《廣州民國日報》，

的，就必須強化英軍濫肆屠殺的形象，因此由所謂「惠州各界援助稔山慘案大會」敘述的「慘案真相」乃是：

3月23日上午8時，……英兵兩百餘人……分頭登陸，隨即亂放步槍，向村民大肆屠殺，人民倉促卒莫及逃避，為槍射擊死傷枕籍，情形極慘。同時在砲艦上施放開花大砲，向后州、三領州、龜洲等鄉轟擊，登時火煙瀰漫，各州村落經此掃射，完全變為瓦礫之場，死傷無算。彼砲艦仍繼續向內地隨時施放大砲，又同時飛機四架徊翔天際，施放炸彈，村民呼天莫救、喊地莫聞，只得在英帝國主義者如宰如屠……。⁷⁴

事實上，根據事件後不久惠陽縣縣長羅俊所呈報的慘案詳情，則與前述故事版本大相逕庭，似應較為公允，也與前述英國報告內容相近，雖仍指控英軍有砲轟以及燒村之舉，但卻詳述英軍登陸時即「散發傳單，命鄉人速離該鄉」，之後才縱火燒村與砲轟屋舍。當地中國人死傷者多半乃因護屋心切而不幸慘遭火焚，亦有見屋舍被毀憤而自殺者。文中並未提及英軍士兵或砲艦有刻意殺人者。

23日上午6時，有英艦5艘、飛機2架、英兵二千餘人、華人英兵十餘人同時到達稔山海口，紛紛登陸，飛機則徊翔天際，(並)散發傳單，命鄉人速離該鄉。駛入魚后洲之戰艦2艘，則發砲轟擊，計龜洲六十餘戶盡化灰燼，海州四十餘戶、房屋百餘間，亦被焚去四五十間，計三洲合被焚房屋五百餘間、被用電油燒斃婦人洪林氏一口。範和岡鄉人則因見英兵欲來焚屋，即集眾大聲呼抗，致被英艦開砲擊毀房屋數間。當時起出被擄英女二人。焚殺後景況：各鄉既被焚燬，難民之無家可歸者，觸目皆是。當時龜洲鄉有憤激自縊者數人，又有鄉婦二人撞石自盡，慘不忍睹。⁷⁵

1927年3月31日，2版。

⁷⁴ 〈惠州各界電告稔山慘案真相〉，《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31日，5版。

⁷⁵ 惠陽縣縣長羅俊在第一次電文報告中，只稱「梗(23)日晨突有英艦四艘、飛機二架到縣屬稔山海面，砲燬龜洲、厚洲、三嶺洲民房千餘間，隨派兵登陸到稔山範和岡等鄉，勒限本日交擄交匪，否則實行砲燬等情。」但因此報告過於簡單，廣東省政府乃命惠陽縣再「速查實情報告」，故惠陽縣乃又呈報第二次詳情報告，亦即本文中引文所述。見〈廣東省政府呈英國軍艦及飛機到惠陽縣屬稔山海面焚屋殺人造成

如果仔細比對「稔山慘案大會」與惠陽縣所描述的事件經過，可知前者顯係加油添醋後的版本，目的無非在藉此鼓動公眾輿論，以為外交之助。與此同時，廣州當局也策動示威遊行與抗議運動，一時之間風聲鶴唳，廣州沙面英租界陷入警戒狀態，香港總督則大幅增兵中英邊界以確保廣九鐵路南段的安全。⁷⁶

除了前述的輿論宣傳、示威造勢外，廣州當局也為此案與英國進行外交交涉。⁷⁷3月26日，廣州當局照會英國廣州總領事館，抗議英國以進剿海盜為名，入侵大亞灣、登陸燒毀村屋，侵害中國領土主權、有違國際法：

英兵到拜亞士灣(大亞灣)登陸，係侵犯我國領土主權，縱火焚燒民居船隻，更屬殘暴之舉，至藉口剿匪，懲罰良民，以為報復，尤為近代法律觀念之所不容。況剿辦該灣海盜一事，自經發生新寧劫案以來，本政府已迭次派兵進剿，……縱一時未盡蕩平，香港政府豈容藉口一、二新生盜案，逕遣英兵登陸，橫施此類不法行為，且事前貴總領事官並未將香港政府此種軍事行動通知我方。⁷⁸

4月5日，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正式向英國外交官員抗議英軍焚燒民居之事。5月，廣州當局兩度照會英國，認為廣東海盜問題僅是摧毀大亞灣內的海盜據點是毫無用處的，因為「大亞灣海盜劫掠事件，是香港、新加坡與上海海盜組織的成果。」所以必須從來源，先消滅上述地方的海盜組織，才能根本解決海盜問題。⁷⁹7月初，廣州當局又以強硬口吻痛責英

慘案請嚴重交涉(1927年10月21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0553005。關於惠陽縣此篇報告，《廣州民國日報稍後》亦有刊載，見〈惠陽縣長呈報稔山慘案詳情〉，《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4月2日，2版。

⁷⁶ 〈粵人對英艦炮擊比亞斯灣事件：示威〉〈英兵四千增防廣九路：稔山慘案…粵當局確於二十七日提出嚴重抗議〉，《世界日報》，1927年4月1日，3版

⁷⁷ 惠陽縣在1927年3月24日即將稔山事件以電報方式呈報廣東省政府，省政府乃電請外交部提出嚴重抗議。見〈廣東省政府呈英國軍艦及飛機到惠陽縣屬稔山海面焚屋殺人造成慘案請嚴重交涉(1927年10月21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0553005。

⁷⁸ 〈外交部抗議英兵在拜亞士灣焚殺：提出嚴重抗議〉，《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28日，3版。

⁷⁹ Note from the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Canton, 6 & 28 May 1927, cited from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 24/202:0024.

國以武力介入中國內政事務，嚴重侵害中國主權，同時也嚴詞駁斥香港總督的合作進剿海盜要求：

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均不可能接受與外國合作鎮壓其境內海盜的要求。外國不應以此為藉口，就侵害一個友善國家的主權……。英國縱火、殺害無辜百姓的行動，是不恰當與殘忍的，不但違反國際法慣例，也將抵觸人道原則。⁸⁰

7月29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給廣州總領事的照會信中，則再次強調廣東海盜大本營在香港，大亞灣不過只是海盜逃亡路線而已，故英軍進攻此地並無法解決海盜問題；至於英國所提進剿廣東海盜之事，伍朝樞則聲稱此為國民政府的當務之急，但卻無庸英國操心。⁸¹

由上述經過，可以發現廣州當局(國民政府)採取兩面手法來處理英國的大亞灣軍事進剿行動：一方面是對內，利用英軍焚燒村落的事實來進行宣傳，將之「慘案化」，成為反帝宣傳的素材，鼓動公眾輿論，進而為北伐行動張勢；⁸²二方面則是對外，仍是依循一般外交途徑來交涉此事，試圖從國際法與現實情況，來阻止英國的後續行動。首先就對內輿論宣傳來說，廣州當局刻意不提廣東海盜問題的來龍去脈與對英船的重大危害，只是一味地誇大英軍的暴行。⁸³究其實際，英國進攻大亞灣稔山鎮的軍事行動，僅為

⁸⁰ “Note from the Canton Government,” July 2, 1927, cited from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21 1927, CAB, 24/202: 0024.

⁸¹ 伍朝樞以發生於1927年7月20日的Solvikén號事件為例，認為「充分證明海盜組織是設在香港」，因為海盜是在香港偽裝乘客登船，而大亞灣不過作為海盜登岸卸下劫掠物品之用。Letter from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Canton, to H.M. Consul-General, Canton, 29 July 1927, SP 1927, no. 7, 181.

⁸² 有趣的是，稔山事件發生後，廣東省政府特別要求惠陽縣應「責成鄉民勿滋事端」，惠陽縣則在收到指示後，隨即「勸導該處鄉民靜候解決」。換言之，廣州當局一面要求作為事件實際受害者的惠陽縣民勿滋生事端，二方面卻利用稔山事件為素材，以鼓動整個公眾輿論。此兩面手法可以盡收稔山慘案的輿論宣傳之效，卻又可以避免引起更大的中英衝突事件，實乃高明的作法。見〈廣東省政府呈英國軍艦及飛機到惠陽縣屬稔山海面焚屋殺人造成慘案請嚴重交涉(1927年10月21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0553005。

⁸³ 日本外務省亦注意到廣州當局的輿論宣傳策略，稱在英軍行動之後，3月26日《廣州民國日報》、《國民新聞》等機關報即大幅報導英國帝國主義的行動已造成「惠陽稔山地方民宅兩千餘戶遭到焚燬、死者千餘人」，同日廣州當局總政治部也召集新

單純報復性質，目的在燒毀海盜村落以儆效尤，非在殺害村民。遑論此行動如果真如《廣州民國日報》所言造成千人死亡，恐早已成為民國史上第一大慘案，其嚴重度亦將超越五卅事件！其實，關於此次英軍行動僅《廣州民國日報》大肆宣傳，國內其他各大報均未跟進。連國民黨在上海的機關報《民國日報》亦只稱「粵人因英兵焚燬良民村莊大為憤恨，國民政府已對眾聲明，將採取充分計畫，交涉英人暴行」，並未渲染英軍有殺害百姓之事。⁸⁴其次，從廣州當局與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對英交涉過程來看，其訴求基本上是從國際法著眼，強調英軍登陸惠陽稔山焚燒民居一事已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廣東海盜問題本為中國內政事務，無論如何不須英國越俎代庖，亦無粵英合作的可能；況且就現實情況而言，廣東海盜犯罪網絡遍及海外，大亞灣水域僅為其撤退路線，進剿此地村落也無法根絕海盜行為。

1927年8月底日陞輪劫案後，因英軍再次對大亞灣沿岸村落採取軍事行動，為了反制英軍暴行，廣州、香港、汕頭等三地工人抵制英輪行動，隨即如火如荼地展開，造成英船駛抵港口時無法起卸貨物。工人並串連商會，希望共襄盛舉，同時也試圖聯繫上海商會與工人，以便同步採取抵制行動。⁸⁵這些有計畫、有組織的工人抵制英輪行動，背後可能即是廣州當局運作的結果。

9月發生高州輪劫案後，英國海軍又在珠江流域策動新一波報復行動，動用軍艦攻擊太平、石岐等處，國民政府方面則再度透過外交途徑，由外交部在9月7日向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璧約翰(J. F. Brennan)遞交了第一次的抗議照會。10月19日，廣東特派交涉員陳長樂又照會璧約翰，要求依法懲處與此暴行有關的官員，同時也保留求償的權利。11月10日，陳長樂正式針對英軍攻擊事件提出賠償、懲兇、保證等三項要求，希望英國方面應針對砲擊所造成的損失給予賠償，懲罰下令動武的官員，以及保證將來

聞記者，講述宣傳手法，3月29日則策動示威運動。〈外國側ニ於テ執リタル海賊取締ニ關スル強力手段ノ事例〉，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第二課資料，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一卷，F-0138/0139-0141。

⁸⁴ 〈粵人對英兵放火之激昂〉，《民國日報》(上海)，1927年3月29日，4版。

⁸⁵ 此三處商會雖未立即同意採取抵制行動，但由於碼頭工人的罷工，實際上已造成上海往來廣東、香港的貨物出口受阻停頓。見〈兩處抵制英輪〉，《申報》(上海)，1927年9月17日，13版。

不會發生類似的攻擊行動。在抗議照會中，陳長樂強調：

從地方損失的情況來看，英國砲艦的行為是殘酷、不人道且毫無理由的。尤有要者，此行為侵害中國主權，也破壞了中英關係。因此，我第三次遞交抗議照會以及兩份損失報告，要求香港政府必須賠償這些損失，並嚴厲懲處負責的官員，同時為了雙方友誼關係，也應保證將來不會有類似行為發生。⁸⁶

至於求償清單，則引據由南海縣與高明縣所提交的兩份損失統計：

表4：廣州當局所提的求償清單(1927年11月)

來源	英軍攻擊地點	損失金額(元)
南海縣報告	太平村	570,260
高明縣報告	扶麗村(石岐村)	2,192
總計		572,452

雖然9月至11月間廣東特派交涉員曾為英國海軍的攻擊行動三度遞交抗議照會，但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璧約翰卻故意置之不理。在給英國駐華公使藍普生(Miles Lampson)的報告中，璧約翰嘲諷道：

我對於此照會的唯一評論是，假如廣州當局真的能夠有效控制這些村落，並且有辦法執行詳細的損失調查的話，他們應該也要有能力阻止海盜這幾個月來利用這些村落為根據地進行劫掠行動。⁸⁷

換言之，璧約翰認為英國根本無須回應廣州的求償要求，因為廣州當局完全無法有效治理這些村落，故此類損失統計也顯得毫無意義。

是年12月底，新任廣東特派交涉員朱兆莘只得再度照會英國總領事，要求通知香港總督立即處理後續事宜。此外，除了原先的求償要求外，朱兆莘又提新的額外求償清單：⁸⁸

⁸⁶ Letter from Ch'en Cheong-lok,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Affairs, Canton, 10 November 1927, *CO*, 129/507/3.

⁸⁷ J. F. Brenan, Acting Consul General, Canton to 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14 November 1927, *CO*, 129/507/3.

⁸⁸ Letter from Chu Chao-hsin,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Affairs, Canton, 31 December 1927, *CO*, 129/507/3.

表5：廣州當局第二次所提的額外求償清單(1927年12月)⁸⁹

項目	數量	損失情況	估價(元)	備註
大型駁船	1	被英軍焚燬	360	
中型駁船	1	被英軍焚燬	250	
小型駁船	1	被英軍焚燬	200	
大型木屋	1	被英軍焚燬	240	
中型木屋	1	被英軍焚燬	190	
小型木屋	1	被英軍焚燬	140	
來福槍	10	被英軍焚燬	1,800	每枝180(元)
來福槍	10	被英軍沒收	1,800	每枝180(元)
總計			4,980	

除了外交抗議外，廣州當局也試圖動員群眾力量，透過經濟抵制的方式來反擊英國海軍的報復行動。廣州當局雖然表面上宣示性地將部分勒索輪船的西江海盜槍決，並派出軍艦巡弋河道，表達解決西江海盜問題的決心，⁹⁰但同時經濟抵制運動似乎也悄然醞釀。9月中旬之後，懸掛英國旗的輪船在從香港經西江水域往來梧州時，即發現廣州、肇慶等地已陸續開始展開抵制行動。每逢英國旗船駛抵時，原先負責接駁的駁船均拒絕駛近，導致該處客貨運輸均告中斷，但懸掛華旗的輪船則完全不受影響，照常由駁船接送客貨。肇慶當局甚至下令禁止懸掛英國旗的船隻在該地起卸客貨，造成英國與香港輪船運輸的重大損失。⁹¹

六、檢討分析與另覓良方

從1927年3月至9月，英國海軍先後三次出擊進行「獨立懲罰行動」(independent punitive action)，並派遣軍隊登陸燒毀海盜村落與船隻：

⁸⁹ List of losses incurred as the result of the burning of Taipinghu, etc., by British warships, CO, 129/507/3.

⁹⁰ 〈槍決勒收西江行水匪黨〉、〈實行派艦保護河道〉，《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24日，第3張第2頁。

⁹¹ 〈輪船不載肇慶貨客之原因〉，《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13日，第3張第2頁；〈高州輪船停泊肇慶情形〉，《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24日，第3張第2頁。

表6：英國海軍登陸懲罰廣東海盜行動(1927)

海盜劫船時間	受害船隻	英軍行動時間	英軍登岸攻擊地點
1927.3.21	SS <i>Hopsang</i>	1927.3.23	廣東大亞灣沿岸
1923.8.30	SS <i>Yashin</i>	1927.9.1	廣東大亞灣沿岸
1927.9.1	SS <i>Kochow</i>	1927.9.3	廣東西江沿岸

1927年3月、9月英國海軍兩度對大亞灣地區懲罰用兵後，部份英文報紙即曾對其大表肯定之意，認為這是處理廣東海盜問題唯一可行的良方，並嘲弄中國海盜「小兒科式的把戲」終將遭到英國海軍的懲戒，鼓吹英國應採取更多激烈的行動來制止香港附近水域的海盜亂象：

英國海軍艦隊司令已派遣第二次的懲罰行動，大亞灣的海盜據點又再一次遭到摧毀……。假如第二次的行動仍證明無法奏效、未能制止中國海盜繼續其小兒科式的把戲的話，英國海軍將會採取更為激烈的措施……。唯一能夠處理大亞灣海盜問題的方法，就是無須警告，逕自派遣一支軍隊登陸作戰，給予海盜以牙還牙的懲罰。⁹²

(一)軍事進剿行動的成效

關於這三次登岸懲罰行動，英國駐華使館事後檢討，坦承雖然「此類行動會有明顯的弊病，但只要廣州當局不擔負起責任，認真處理海盜問題，英國只能一再採取相同的懲罰行動，因為這是唯一能夠產生嚇阻作用的方法。」⁹³

1927年11月香港總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nmenti)在北京外交團「防制海盜措施委員會」上報告動用海軍武力登陸進行懲罰行動的成效，亦認為「有很好的結果。有一段時間沒有再發生海盜事件。」⁹⁴在1928年1月給殖民

⁹² 關於英國海軍將「制止中國海盜小兒科式的把戲」，其原文乃是用“...to weam the Chinese pirates from their playful ways...”。該語句字面意義乃指大人教訓小嬰孩(中國海盜)，使其斷奶並終止幼稚行為，其實則帶有西方以家長式權威管教不聽話的中國小孩之意。見*Times of Ceylon*, 3 September 1927, cited from “Bias Bay: Ceylon Papers Comment on Raid,” *The China Mail*, 21 September 1927.

⁹³ Memorandum by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23 September 192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一卷，F-0138/0145-0148。

⁹⁴ Minutes of A Meeting to Discuss Anti-Piracy Measures, held at the Japanese Legation at 11:00 a.m., 16 November 192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

部部長的報告中，香港總督金文泰更是大力讚揚「懲罰措施的功效」(“efficacy of the punitive measure”)：1927年3月與9月的軍事行動後，香港方面曾擔心英軍的報復行動可能引起不必要反彈，但事實上當地百姓「完全沒有任何負面觀感的跡象」；更重要的是，英軍行動成功分化了一般守法的大眾與海盜組織，並迫使前者團結起來反對後者。⁹⁵因為根據香港警察派往大亞灣沿岸區域調查的線民回報，在9月英軍攻擊稔山、范和岡、長排等地鎮村後，該區耆老與仕紳曾在12月召開一次大會，要求當地主要海盜首領林才秀等人必須負責賠償遭英軍焚燬的屋舍，同時也議決未來任何參與海盜案件之人，均將被逮捕並移交給有關當局。地方耆老仕紳的堅決態度，也迫使海盜幫眾在策劃劫案時必須更為小心謹慎，以防消息走漏。⁹⁶

英國海軍情報處在1928年初的報告中，雖然坦承外界對於軍事懲罰行動曾頗有質疑，但還是強調軍事懲罰行動已成功迫使海盜必須轉移陣地，而對海盜來說要去另覓大亞灣的替代地點其實並非容易之事。海盜在大亞灣有著很深的人際網絡組織，因此極易藏匿擄獲品與行蹤，但在其他地方卻不見得可以如此便利。所以，英國海軍在大亞灣的軍事懲罰行動，不但懲罰了海盜，同時也能夠預防海盜事件的一再發生。⁹⁷

其次，也可以進一步分析英國在處理廣東海盜問題上態度的轉變。雖然1926年底英國政府即已做出準備採行軍事懲罰行動的決策，但受到國民政府北伐與反英運動等複雜局勢的影響，英國外交部與駐華使領人員對於動武問題不無疑慮，也擔心會影響到上海的安危。1927年3月23日香港

第一卷，F-0138/0180-0183。

⁹⁵ Cecil Clementi, Governor, Hong Kong to L.C.M.S. Amery, Colonial Office, 22 December 1927, CO, 129/507/3.

⁹⁶ 此線民乃是香港警方所屬的「大亞灣線民」(Bias Bay informer)，客家人，自稱為「往來香港、下涌、稔山及其他大亞灣區域的行商(travelling trader)」。根據該線民估計，村民大會乃是在1927年12月13日召開，除了主持會議的耆老仕紳外，大約還有約兩百名的村民參與了會議。不過，該線民也在報告中坦承，他無法判斷耆老仕紳最後是否會真的會去執行村民大會的決議。至於報告中所提到的林才秀，則是策劃1927年1月雙美輪劫案的主要海盜首領，該輪遭綁架的5名人質後來被勒贖6萬元，並在汕頭進行交贖。Reprot by A. Reynolds, Acting Chief Detecive Inspector, Hong Kong, 28 December 1927, CO, 129/507/3.

⁹⁷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106, 15 March 1928, 39, CO, 129/507/3.

政府採取的軍事懲罰行動，不過是總督單方面的權宜決策，事先並未取得殖民部或駐華公使的同意。然而，在3、4月間，中國的情況又有很大的改變。上海、南京先後發生暴動，尤其南京暴動情況尤為嚴重，多名外人被殺，英國領事亦受傷，列強決定採取強硬措施進行報復，英、美海軍艦艇乃砲擊南京。4月，清黨行動在南京、上海廣州等地展開，國共之間衝突不斷，國民政府內部亦分化成南京與武漢兩派，南京堅決反共，武漢則仍與中共合作。7-8月間武漢國民政府亦與中共分道揚鑣，接著便是中共的武裝行動與國民政府間的內戰。⁹⁸簡言之，國民政府本身內部的分化，加上列強間對於中國局勢動盪所導致損及外人利益事件，立場已逐漸重回較為激烈的砲艦外交路線，⁹⁹此類事態發展一方面削弱國民政府與英抗衡的力量，另一方面則強化英國在處理海盜問題上的立場。因此，1927年下半年英國對於直接出兵進剿廣東海盜的軍事行動，不但立場漸趨堅定，行動的規模與範圍也日漸擴大。1927年10月愛仁輪劫案(SS Irene Piracy)發生後，¹⁰⁰香港總督金文泰又擬議只要再次發生英輪劫案，駐香港的英軍即會在大亞灣沿岸地區展開新一波的軍事報復行動，且無論是登陸的軍隊人數抑或是準備摧毀的村莊範圍，其規模預計均將超越前三次。¹⁰¹

(二) 軍事進剿行動的檢討

英國除了積極實施軍事懲罰行動，動用海陸軍隊攻擊海盜據點，燒毀房舍與船隻，同時也一再向廣州當局施壓，要求派遣軍隊鎮壓大亞灣水域的海盜，希望藉此遏止廣東海盜猖獗的現象。廣州當局最後在英國壓力下，

⁹⁸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556-566。

⁹⁹ 關於1927年3月南京事件中，列強如何以激烈型砲艦外交來因應中國北伐中所推動的革命外交，可以參見應俊豪，〈1920年代列強對華砲艦外交的分析研究〉，收入《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外交》（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2），頁1-26。

¹⁰⁰ 愛仁輪為華輪，隸屬於輪船招商局，1927年10月在從上海前往廈門途中，遭到偽裝乘客的海盜襲擊，並將其劫往廣東大亞灣。“British Submarines to Rescue in Bias Bay,” *The Strait Times*, 21 October 1927.

¹⁰¹ A Telegram from Commander-in-Chief, China Station, cited from Despatch from Miles Lampson,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to Austen Chamberlain, Foreign Office, London, 18 November 1927, CO, 129/507/3.

選擇與英國合作，派遣軍隊進攻大亞灣水域，順利擊斃大批海盜。¹⁰²然而，強硬的軍事行動最後是否有達到英國預設的目標呢？

首先，事實的結果證明，英國海軍的三次進剿行動依舊未能逼使廣州當局出面解決海盜問題。廣州當局在英軍行動後並未對大亞灣區域展開大規模清剿海盜行動，僅惠州警備司令、國民革命軍第 18 師師長胡謙曾在 1927 年 8 月派遣軍隊進剿大亞灣海盜，但也只捕獲 1 名海盜，且該名海盜在支付 800 元罰金後隨即獲釋。¹⁰³而胡謙本人更是在進剿海盜行動後不久即因與第 25 師師長李漢魂衝突而慘遭殺害。¹⁰⁴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即研判，廣州當局官員雖然多次重申有意願處理海盜與土匪問題，但事實上由於政府內部軍事將領之間的激烈傾軋，造成「無人願意或膽敢派遣軍隊前往偏遠地區去維持秩序」。例如胡謙本人即與李濟深不合，也與盤據在惠州地區的陳炯明殘部有衝突。英國總領事館認為，大亞灣海盜所劫掠的跨洋輪船航線，對於胡謙來說並無任何利益上的損失，反倒可以利用海盜問題來困擾香港當局，同時也可以「藉此牽制在廣州的政敵」。胡謙遭殺害後，取而代之的張發奎、黃琪翔等人，不但部眾軍紀不佳，同時也與主持廣州軍政的李濟深、黃紹竑等瀕臨衝突的邊緣，「因此，同樣也不可能採取任何有力的行動，來保護航運。」¹⁰⁵換言之，受到內部矛盾衝突的牽制，1927

¹⁰² 此為英國外交部次長 G. Locker-Lampson，在下議院針對議員質詢中國水域海盜問題時，所做的答覆。見 Oral Answers, 14 November 1928, His Stationery Majesty's Office (Great Britain),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Commons* (London: His Stationery Majesty's Office)(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HC Deb*), vol. 222, 857-859.

¹⁰³ Reprot by A. Reynolds, Acting Chief Detective Inspector, Hong Kong, 28 December 1927, *CO*, 129/507/3.

¹⁰⁴ 胡謙，江西人，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為同盟會成員，晚清民初歷任贛軍營長、參謀、處長等職。1923年孫文在廣州成立大本營後，曾任軍務局局長、代理軍政部次長、黃埔軍校教育長等職。1926起，任國民革命軍第6軍第18師師長，駐防惠州，並兼任惠州警備司令。1927年秋天，因與第25師師長李漢魂所部衝突而遭到殺害。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胡謙」條，頁563。

¹⁰⁵ J. F. Brenan, Acting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17 November 1927, *CO*, 129.507/3. 其實英國總領事館的研判相當精確，廣州內部確實暗潮洶湧，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時國民政府內部正處於寧漢對立、清黨、分共等對立緊張局勢下，而廣州情況也隨著張發奎率軍南下後而日趨複雜。不久之後，1927年11月下旬，張發奎、黃琪翔等即利用李濟深離粵之機，聯合李福林發動

年廣州當局並未因為英軍的獨立軍事行動，而具體改變對於大亞灣海盜問題的處理態度。

其次，廣東內外水域的海盜劫掠情況並未有顯著改善。大亞灣海盜劫案即仍然此起彼落。例如 1928 年 5 月的德安輪劫案(SS *Tean Piracy*)、¹⁰⁶ 9 月的安慶號事件(SS *An King Piracy*)，¹⁰⁷ 劫掠過程中不乏有英籍船員傷亡。況且，很明顯的，從安慶號事件中的海盜行為模式來看，當初香港當局發動軍事行動攻擊大亞灣的海盜據點，並不會終止海盜事件，因為只會迫使海盜轉移登岸陣地，從大亞灣遷到東邊的紅海灣，然後繼續劫掠輪船。¹⁰⁸ 至於廣東珠江內陸水域的海盜情況，同樣也沒有轉好的趨勢。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在 1927 年 11 月的報告中，即強調「目前廣東省內陸水道的海盜與土匪搶劫事件仍然不受控制，貿易只能夠在惡劣的困境中進行。」¹⁰⁹ 英國海軍砲艦知更鳥號(HMS *Robin*)在前往西江水域三水、西南鎮等處調查海盜活動情況後，也表示該水域海盜勢力盛行，英商亞細亞輪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所雇拖船在 1927 年 11 月初即曾在三水、西南鎮附近遭到海盜攻擊。而經過英國海軍的調查，此批海盜竟然就是 9 月時在太平沙附近劫持高州輪的同一批海盜。他們活動的範圍廣及南海、佛山一帶。換言之，前述英國海軍的第三次武裝懲罰行動，並不能有效阻止海盜繼續犯案。¹¹⁰ 又例如 1928 年 1 月的山南海輪劫案(SS *San Nam Hoi Piracy*，該輪原中文船名不詳，

武裝政變，驅逐黃紹竑等桂系勢力，宣布擁護汪精衛的武漢政權，史稱「廣州事變」。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558-564。

¹⁰⁶ 德安輪為英商太古洋行往來越南海防與海南海口之間的輪船，1928年5月，廣東海盜偽裝乘客在海口登船，將船隻劫持到廣東大亞灣，幸好海關船艦與英國海軍軍艦趕到拯救。“The Tean Piracy,” *The China Year Book*, 1929-30, 801.

¹⁰⁷ 安慶輪為英商太古輪船公司往來新加坡與香港之間的大型客輪，1928年9月，數十名的海盜偽裝乘客在安慶輪途經海南海口後發動突襲，將輪船劫往廣東大亞灣東面的紅海灣。搶劫過程中，英籍船員試圖抵抗，但大副、輪機長不幸當場慘遭擊斃，船長與三副也負傷。“The An King Piracy,” *The China Year Book*, 1929-30, 801-802.

¹⁰⁸ Oral Answers, 14 November 1928, *HC Deb*, vol. 222, 857-859.

¹⁰⁹ Acting Consul-General Brenan to Sir M. Lampson, 17 November 1927, *CO*, 129/507/3.

¹¹⁰ 由於此類攻擊事件頻傳，知更鳥號砲艦艦長還特地透過亞細亞石油公司代表的聯繫，與三水、小欖等地的警察首長會晤，以求解決之道。Report from A.L. Poland, Lieutenant Commander, Commanding Officer, HMS *Robin*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11 November 1927, *CO*, 129/507/3.

此處為音譯)，則更是造成慘重死傷，英籍大副與兩名印度警衛因此喪命。¹¹¹顯而易見，英國海軍報復行動所產生的嚇阻作用，成效相當有限。

其實，早在 1927 年 9 月下旬北京外交團的〈中國水域海盜問題〉通報中，即對列強使用軍事武力進剿海盜行動下了初步的評語：

過去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要動用外國海軍武力去懲罰海盜，或是組織陸軍遠征軍去攻擊海盜可能居住的村落，都是極端困難與幾乎不可能之事。唯有對窩藏海盜組織的社群施以整體的懲罰，才有可能根絕海盜的罪行。然而，外國政府自然不可能同意採取如此極端的措施。¹¹²

派遣軍隊登岸剿盜不但會引起極大的爭議，也不可能根絕海盜現象！除非英國政府下定決心，不顧人道或國際輿論，將所有海盜出沒的村落全部毀掉，但這又與戰爭行為有何差異？後續的反作用力也不是英國政府所能承擔的。

再者，軍事報復行動可能引起的中國反英情緒，也是英國必須列入考量的。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璧約翰在給英國公使藍浦生的報告中，即坦承目前三次的軍事進剿行動是否能夠有效防制海盜猶未可知，但卻已經在廣州引起仇英情緒。更令璧約翰擔憂的，不只是廣州政府內部，甚至對於公眾輿論有著重大影響力的學生階層，都已產生「可觀的仇英傾向」：

對於那些瞭解事情經過的人來說，或許會理解這些仇英情緒乃是不理智的。然而，問題是，這些人並不瞭解所有的事情，他們只知道聽從中國輿論的各種宣傳。也因此，無論他們的仇恨是如何的不理智，在現實上我們就必須慎重評估他們的仇恨。

璧約翰雖然不太願意去評估海軍報復行動是否真的能夠有效嚇阻海盜，但

¹¹¹ 1928年1月的山南海輪劫案發生在香港與廣東江門間的西江水路上：為數約15-30名的海盜偽裝乘客在廣東江門登上英船山南海輪，之後於航程中趁機發動突襲，船長與船員們積極抵抗，最終雖然擊退海盜，卻還是造成三死四傷的悲劇：英籍大副與兩名印度籍武裝警衛遭到擊斃，另外4名印度武裝警衛則負傷。“The San Nam Hoi Piracy,” *The China Year Book*, 1929-30, 799; From China, Mr. Brenan, Canton to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18 January 1928, CO, 129/507/3.

¹¹² Piracy in Chinese Waters, Circular 142, 21 September 192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一卷，F-0138/0149-0150。

卻「不得不強調，如果海軍繼續此類行動，以目前廣州公眾情緒的騷動情況來說，勢必將會引起新一波的反英運動與經濟抵制。」¹¹³

(三)情況改變與另謀他法

首先，在英國駐華公使館的努力推動下，自 1927 年 11 月起，北京外交團英、美、日、法、義五國公使開始進行「反制海盜措施會議」(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Diplomatic Body to Discuss Anti-Piracy Measures)，共同會商解決中國海盜問題之法。¹¹⁴也因此，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M. Lampson)與香港總督金文泰決定，應等待透過國際合作模式來處理廣東海盜問題，至於軍事報復行動則應停止，並由英國海軍「中國艦隊」司令採行預防海盜措施。¹¹⁵換言之，尋求國際合作已為英國此時最優先的防盜策略，並取代現行的獨立軍事進剿海盜行動。

其次，自 1928 年開始，粵英關係也逐漸有了很大的變化，原先的對立逐漸呈現出較為和緩的態勢。主政廣州當局的李濟深也與英國、香港政府發展出不錯的互動關係，李濟深甚至兩度親自向香港總督金文泰表達有解決廣東海盜問題的意願與決心。職是之故，如果再度發生英船劫案時，英軍究竟是否仍應循 1927 年模式立即採取軍事報復行動一事，金文泰本人態度也有所改變。他傾向調整現行方案，主張在英軍正式採取軍事報復行動前，英國應透過駐廣州總領事館與廣州當局進行交涉，督促其採取具體行動進剿海盜，同時也提供英國海陸軍的合作與協助。除非廣州當局拒絕自行採取行動，也不願意與英國合作，否則英軍不應該進行軍事報復行動。況且，金文泰也坦承英軍的報復行動，事實上對於嚇阻海盜的成效不大。

¹¹³ 此份報告除了給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外，同時也將副本送給英國外交部、香港總督府、上海總領事館以及英國海軍「中國艦隊」司令。見 J. F. Brenan, Acting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17 November 1927, CO, 129.507/3.

¹¹⁴ The Charge in China (May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7 November 1927, FRUS, 1927, vol. 2, 331-333.

¹¹⁵ Notes of A Meeting at the Foreign Office on Wednesday, 18 January 1928, CO, 129/507/3.

因為要真正處理大亞灣海盜問題，英軍不能僅是報復而已，而必須派遣軍隊實際佔領大亞灣地區一段時間(不少於一週)。不過，軍事佔領方案牽涉過大，除必須詳細評估劫案性質與佔領計畫外，且還需英國政府的正式授權，所以並非可以立即執行。因此，金文泰認為「現階段對大亞灣進行報復行動，並無任何有效的作用。」¹¹⁶

尤有要者，英國內閣「帝國國防委員會」所屬的「參謀首長附屬委員會」(Chiefs of Staff Sub-Committee)在 1929 年 1 月報告中，終於坦承武力政策無助於解決海盜問題：

雖然已經嘗試懲罰性行動，但它們並不能成功地阻止海盜事件。因為不太可能藉此捕獲海盜，而且還可能造成與海盜活動無關之人一定程度的傷害……。因此，既有的懲罰行動，充其量只有短暫的效果。¹¹⁷

換言之，軍事懲罰行動證明不但無法解決海盜問題，反倒有可能造成無辜百姓的損失。

當軍事懲罰行動亦無法奏效之際，英國又開始苦思其他的因應方案，例如與其大費周章自行派兵或是要求廣州當局去剿海盜，倒不如直接在商船上部署士兵。因為海盜行蹤飄忽不定難以掌握，故進剿成效有限，但是一般來說除了珠江流域的海盜事件外，廣東海盜劫持商船的模式卻是固定的，即「內部海盜」模式。所謂的「內部海盜」(internal piracy)，指的是海盜並非另外乘船從外部攻擊商船，而是偽裝乘客登船，再伺機從內部發動攻擊，劫持輪船。¹¹⁸因此要降低海盜事件的發生率，除了必須在港口執行嚴格檢查，防止海盜挾帶武器登船以外，如果直接在船上部署正規的武裝士兵，不但可以增加嚇阻力量，更可以大幅強化商船因應海盜攻擊的反擊能力。其次，除了透過英國海軍武力的保護外，也有部分商船最後選擇妥協，即藉由支付海盜首領保護費的形式，來換取航行的安全。例如有些新加坡船商即以每艘船每年 2,000 元為代價，透過香港的秘密組織，將保護

¹¹⁶ C. Clementi,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 to Major General C.C. Luard, General Officer Commanding Troops, South China Command, 7 May 1928, *CO*, 129/507/3.

¹¹⁷ Report by the Chiefs of Staff Sub-Committee, January 30, 1929, *CAB*, 24/202:0024.

¹¹⁸ Report by the Chiefs of Staff Sub-Committee, January 30, 1929, *CAB*, 24/202:0024.

費轉交給海盜首領，從而免除海盜攻擊。¹¹⁹

七、英國派員登陸剿盜的正當性問題：條約與國際法

自香港政府採取軍事懲罰行動，自行派員登陸攻擊海盜據點之後，香港一個負責調查海盜劫持事件的委員會，在其報告中針對英國的行動提出了解釋，強調進剿海盜是一種「普遍性的國際責任」，既然中國當局不願處理，英國自然可以採取行動：

如果廣州當局拒絕與英國合作，那英國政府採取獨立行動清剿海盜據點的行動將可以充分地合理化，因為這是普遍性的國際責任。¹²⁰在英國駐華公使館向北京外交團遞交的中國水域海盜問題備忘錄中，亦清楚點出中國當局對於海盜問題負有「條約義務」(treaty obligation)與「普遍性的國際責任」(general international duty)。如果中國當局無力自行處理，又不願接受列強的合作時，相關列強自然有「清楚的權利」，可以採取「必要的措施來保其利益」。¹²¹究竟英國進行的軍事懲罰行動所牽涉到「普遍性的國際責任」為何，還有英國行動是否符合中英之間的條約規定，則需深入探究。

依據 1858 年《中英天津條約》，關於英國人船在華遇盜受害問題的處理規定，共有四款，分別是第十八、十九、五十二與五十三款。第十八款規定中國對英人有保護之責，對於傷害英人及其產業的匪徒亦需加以彈壓：

英國人，中國官憲自必時加保護，令其身家安全。如遭欺凌擾害，及有不法匪徒放火焚燒房屋或搶掠者，地方官立即設法派撥兵役彈壓查追，並將焚搶匪徒，按例嚴辦。

第十九款規定英船在中國水域遇搶，中國必須負責追緝海盜，並將失物歸還英人：

¹¹⁹ “Hong Kong Clubs: Skippers Buy Off Pirate Chiefs,”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9 October 1929.

¹²⁰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Sunning Piracy Commission, CAB, 24/202:0024.

¹²¹ Memorandum by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23 September 192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一卷，F-0138/0145-0148。

英國船隻在中國轄下海洋，有被強竊搶劫者，地方官一經聞報，即應設法查追拿辦，所有追得賊物，交領事官給還原主。

第五十二款授權英國海軍可因「捕盜」需要，駛入中國水域，且中國當局還應予以協助：

英國師船，別無他意，或因捕盜駛入中國，無論何口，一切買取食物、甜水，修理船隻，地方官妥為照料。船上水師各官與中國官員平行相待。

第五十三款則是當中國水域海盜影響中外商務時，可由中英雙方共同會商剿盜之法：

中華海面每有賊盜搶劫，大清、大英視為向於內外商民大有損礙，意合會議設法消除。¹²²

由上述諸款規定，可知中國應保護所轄領域(領地及領海)內之英人英船，對於搶劫英人英船之賊盜負有追緝之責，而必要時英國得逕自派遣海軍艦艇追捕中國水域內之海盜，或是要求中英共同會商解決之道。因此關於廣東海盜問題的處理之道，英方部份訴求似乎合乎條約規定，即追究中國政府保護英人英船與肅清海盜之責，以及要求中國政府與英國合作剿盜。然而，條約雖曾規定英國海軍得因捕盜駛入中國水域，卻並未言明可以登岸直接進剿海盜。國際條約基本乃是採列舉主義，凡非明文規定者，英國自然不得自行演繹擴充。其實，從《中英天津條約》上述四款規定中，可以清楚看出關於英人英船在華遇盜受害案件的處理方式，不論發生在中國陸地與水域，均是由中國肩負最大的剿辦權力與責任。而英國所獲得的條約權利，不過侷限在可以處理水域內的海盜問題(派遣海軍艦艇進入中國水域捕盜)。但海盜一旦登岸或是在陸上設立巢穴據點，剿辦權責則均歸中國，英國只能要求中國儘速剿辦，或是要求中英會商解決之道。況且條約中只規定中英「會議」解決海盜之法，並未明確指明由中英雙方一同出兵在陸上進剿海盜。換言之，除了水域上的海盜，英國可以處理外，至於陸地上的海盜，英國只能要求中國處理，或是要求中國一同開會討論解決之法。因此依照條約精神，英國固然可以追究中國剿盜不力之責，但無論如何卻不能自行

¹²² 〈中英天津條約〉(1858年)，收入黃月波等編，《中外條約彙編》，頁6。

派兵登岸剿盜。

其次，除了條約爭議外，英國海軍直接進剿中國海盜，還牽涉到國際法層面的問題。1927年11月北京外交團原先所擬給廣州當局的外交照會中，即曾提及類似的措辭：「海盜被認為是人類社會的公敵，而鎮壓海盜則是所有文明國家政府應肩負起的國際責任。」¹²³英系報紙《京津泰晤士報》(*The Peking & Tientsin Times*)曾大力主張應由英國海軍(與各國合作)，逕自出兵進剿廣東海盜，則「定可於數月之內將南部海盜剿辦肅清」，因為外國海軍出兵攻擊廣東海盜乃國際法所容許：

國際法中，視海盜為人類之公敵，而海盜無論在何處作為，何國人所犯，任何國家之法庭皆得而審訊懲罰之。此亦國際法之成例也。故此英國船於海上捕獲中國海盜，則無將該海盜移交中國當局之義務也。¹²⁴

新加坡英文報紙《海峽時報》(*The Strait Times*)亦宣稱英國在南中國海展開的「清除(海盜)政策」，已為廣東海盜敲了喪鐘，因為「國際法認定海盜為罪犯，所以任何國家都可以攻擊海盜。」¹²⁵上述報導所提到的國際法觀點，可以從19世紀美國知名國際法專家惠頓(Henry Wheaton)所著的《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書找到立論根據，其中提及海盜的緝捕審判之權，不歸海盜隸屬之國所獨有，而是世界各國皆可行使：

各國船隻無論公私，行於大海者，其本國皆得操專權以管制之。然此例但言管制本國律法之案，至於海盜等干犯公法，則非獲罪于某國，乃獲罪于萬國也，無論捕之在何國，或捕之在大海，攜至何國，其國若有法院能司其事者，便有權可審之也。各國按例緝獲海盜等罪犯，若有法院能司其事者，即有權可審之……。¹²⁶

¹²³ The Charge in China (May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7 November 1927, *FRUS*, 1927, vol. 2, 331-333.

¹²⁴ 見外交部條約司譯件，〈中國南部之海盜(譯1924年4月15日《京津泰晤士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檔案》，館藏號03/46/029-29-002。

¹²⁵ "An Occasional Note," *The Strait Times*, 22 July 1927.

¹²⁶ 此段引文乃依據晚清傳教士丁韋良所(W. A. P. Martin)翻譯的《萬國公法》，見Henry Wheaton原著，丁韋良譯，《萬國公法(*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北京，崇實館，1864)，卷2，頁34。

換言之，海盜為「獲罪于萬國」，因此萬國均得捕之、審之。這種國際法主張來自於對於海盜罪的普遍管轄權(Universal Jurisdiction)觀點。自 17 世紀西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簽訂以來，歐洲逐漸樹立主權國家的觀念，國家對於領地、領海及其國民擁有絕對的管轄權，但海盜罪的處理，卻往往被視為是主權國家管轄權的例外情況。因為任何國家只要抓到海盜，即可審判處決之，無論其國籍或是拘捕的地點。換言之，「普遍管轄權的存在，以幾個世紀以來，任何國家有權起訴任何海盜的看法，雖然只是一種抽象的論點，卻從未受到挑戰。」¹²⁷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20 年代國際社會對國際法層次下的海盜定義，已有著嚴格規範化的傾向。1924 年底，國際聯盟行政院(Council of League of Nations)應國聯大會要求，決議任命一個「國際法逐步法典化專家委員會」(Committee of Experts for the Progressive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¹²⁸來處理國際法法典化，並針對各重要國際法問題提出建議，其中對於海盜的定義也有所討論。雖然國聯各成員國對於國際法層次下的海盜問題處理上，最終並未達成共識。¹²⁹但 1926 年初由專家委員會所提出的「制止海盜行為草案」(Draft Provis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Piracy)，還是嘗試去定義國際法層次的海盜問題，「主張海盜行為是指在公海上為私人目的所為的劫掠或對人的非法行為，因此，排除了領海內及為政治目的的行為。」¹³⁰1927 年底，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即曾依據上述草案，來檢討中國的海盜問題，主張外國海軍不得任意介入中國水域附近發生的劫持船隻事件，因為此類案件均不符合國際法下定義的海盜行為：

¹²⁷ Eugene Kontorovich, "The Piracy Analogy: Modern Universal Jurisdiction's Hollow Foundat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45:1 (Winter 2004), 183-238.

¹²⁸ Manley Ottmer Hudson, "The Progressive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4 (October 1926), 655-669. 關於國聯「國際法逐步法典化」的相關歷史資料，亦可以參見"United Nations Docu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Supplement to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4 (October, 1947), 29-148.

¹²⁹ Lawrence Azubuike, "International Law Regime against Piracy," *Annual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15:1 (2009), 43-59.

¹³⁰ 黃立、何田田，〈海盜罪的國際法規制〉，《太平洋學報》，2009年第9期(2009)，頁1-6。

國際犯罪(海盜)的構成要素在於：在公海上危害生命財產、在海洋上無差別地攻擊各國商船、在精神與意圖上有著普遍敵意。因此海盜被視為是「人類的敵人」，任何國家的船隻只要能夠將其拘捕，即可享有審判權。這種依據國際法的海盜罪定義，不但獲得許多頂尖法官的支持，國聯的「國際法進步法典化」專家委員會也在1926年2月提出權威性的論述，並通知國聯成員國。¹³¹

換言之，海盜犯罪的構成要素之一即是必須是發生在公海上的劫掠行為，因此發生在中國領海水域內的劫掠行為並不構成國際法定義下的海盜行為，外國海軍當然無權以普遍管轄權來進行干涉。

尤其是，根據近來西方學者的研究，關於海盜罪的普遍管轄權，畢竟僅是一種理論，而非實際情況。因為考之歷史，幾百年來真正依據此原則而審判的海盜實在屈指可數。¹³²換言之，海盜罪普遍管轄權的觀點，雖然人人熟知，但在現實情況中卻甚少去真的實踐它；亦即它只是一種想當然爾的國際法觀點，而非行之有年的慣例。

關於英軍越界登陸懲罰海盜軍事行動涉及到的國際法問題，及其背後所隱含的帝國主義心態，亦可從國民黨香港支部發佈的宣言略窺一二。該宣言痛斥英國軍事行動的「罪惡」，乃在於縱兵越界，以及明知此行為有違國際法規定，但卻執意為之：

查世界公例，尊重自己的土地，也應該尊重他人的土地，尊重自己的主權，也應該尊重他人的主權……凡軍隊經過他國的境界必先要照會那國的政府，和該管的地方官允准方可，英帝國主義者並無照會，貿然率兵艦飛機侵越國境，他明知對於道理和法律上是說不去

¹³¹ 伍朝樞引據國際法的海盜罪問題，主要乃是針對1927年10月的愛仁輪劫案與英國海軍的攻擊行動而論：廣東海盜將輪船招商局輪船所屬愛仁輪劫持至廣東大亞灣，但正在該灣巡邏英國軍艦卻以愛仁輪遭海盜挾持且拒絕服從停船受檢為由，逕行開砲攻擊，導致愛仁號中彈失火沈沒，24名乘客因此溺斃。〈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致英使藍浦生照會〉，1927年12月22日，國民新聞社，見“A Note from Dr. C. C. Wu,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 Sir Miles Lampson, H.B.M. Minister,” *The China Year Book*, 1929-30, 795-797.

¹³² Eugene Kontorovich, “The Piracy Analogy: Modern Universal Jurisdiction’s Hollow Foundat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83-238.

的，他敢公然為之，就是藐視我國，以為無如之何，這是帝國主義更為可惡之點。¹³³

由此不難看出 1920 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各地出現的反英風潮，事實上其來有自：英國自以為是的帝國主義行徑，往往違背或逾越西方自行定義國際成例，勢必讓中國人憤恨難平，如再加上布爾什維克式反帝宣傳(Bolshevik Anti-Imperialism Propaganda)的刻意渲染，火上加油，反英風潮自然極易形成。

八、結語

1925 年五卅事件之後，粵英關係形同決裂，原有的共同合作剿盜模式無以為繼，但廣東海盜問題卻日益惡化，對香港往來中國各地航運路線構成嚴重威脅，是以香港總督府屢次提案應由英軍自行動武懲治廣東海盜。但是另外一方面，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事行動的順遂，英國外交部與駐華外交使領則極度關切中國局勢的重大演變，擔心北京政權即將傾覆。換言之，此時英國政府陷入兩難之境，究竟應該顧及與國民政府發展更為友善關係，還是不顧一切先處理香港方面苦思解決的廣東海盜問題？

1927 年 9 月英國駐華公使館的海盜問題備忘錄中，回顧英國因應廣東海盜問題的對策，不外乎督促中國政府剿盜，以及提供粵英合作的建議，但事實上英國也持續思考如何以自己力量來解決海盜問題。

雖然英國一方面從不停止督促中國當局採取行動，同時也經常提供合作，但還是必須自行策劃對策以應付現有的情況。而英國的因應對策，部份是屬於保護性質的，但也有部份是屬於懲罰性質的。因此，除了強化對英國商船的保護措施外，如何以暴制暴、採取軍事懲罰行動來進剿海盜，同樣也是英國海盜對策的重要選項。¹³⁴

然而，英國政府內部，尤其是外交部對於軍事懲罰行動有相當顧慮，深怕會引起不必要的反英運動。自孫文確立聯俄容共政策以來，廣州當局

¹³³ 〈香港支部反抗英兵越界焚殺稔山同胞宣言〉，《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4月4日，6版。

¹³⁴ Memorandum by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23 September 192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一卷，F-0138/0145-0148。

即與蘇俄、中共保持親密合作關係，極具感染煽動與殺傷力的反帝宣傳與經濟抵制，也就成為廣州當局推動反英運動時的兩大利器。加上廣州國民政府自展開北伐軍事行動以來，攻勢順遂，不久已掩有江南半壁，隱然有成為中國新主人的架勢，這也迫使英國不得不正視與慎重看待此時的國民政府，亟思與之開展新的關係。所以雖然香港總督一直迷信動用武力才是解決廣東海盜的根本方法，但英國政府依舊遲遲未敢落實先已拍版定案的軍事懲罰行動。

不過，這層顧忌隨著中國局勢演變與列強對華政策的調整，而有很大的運作空間。首先是蔣介石逐漸掌握國民政府，並向江浙財閥與英美勢力靠攏，而與蘇俄、中共劃清界限。其次，以美國為首的列強，也因為擔心北伐行動過激，有可能挑戰列強在華既有的特權地位，而選擇適當介入，於是在南京事件中動用砲艦外交，以軍事報復行動壓制中國革命外交的氣焰。換言之，1927年中國革命陣營的內部分裂與路線調整，以及列強對於北伐軍事行動從靜觀調整為適當介入，從而促成1927年英國武力進剿海盜政策的持續落實。

1927年英國三次動用海軍艦隊進剿廣東海盜，第一次固然是香港總督自行推動武力進剿政策最佳的寫照，但後續兩次則獲得英國政府的強力背書，可視為是當時英國對華政策重要的一環。可惜此政策不過實行約一年多，即證明是荒誕可笑的。英國動用大批軍力，以不成比例的海軍巨艦大砲，來圍剿只有手槍與步槍的海盜，但其結果卻只換來海盜轉移陣地，廣東海盜依然繼續馳騁在南中國海上，任意劫持英國輪船、殺害英籍船員。於是英國海盜防制政策急轉直下，從積極武力進剿又再回歸到最原始的消極自保對策：海盜既然剿之不盡，倒不如強化商船自身的防禦力量，亦即派遣武裝士兵登船戒護，讓海盜不敢劫持船隻，或降低海盜得手的機會。事實證明，在中國局勢混亂的大前提下，英國既然無力改變中國亂象、也不可能根除所有海盜，那麼建立被動但有效的商船防禦機制，而非英國海軍主動進剿，或許才是因應海盜問題的不二法門。然而，這可能又將引起英國海軍與船商之間的角力與爭議，究竟保護商船安全是海軍的義務，還是船商本身的責任。

另外一方面，對於英國片面的軍事行動，廣州當局(國民政府)則採取相當具有彈性的雙重手法予以反制。其一是內部宣傳，將英軍懲治海盜、焚燒村落舉動貼上帝國主義暴行的標籤，並藉由渲染事件過程，刻意將其損害程度大幅提高，操作成「慘案化」，使之與反帝宣傳結合，激起百姓憤慨之心，進而為北伐行動張勢。其二則是對英交涉，表面下透過正規外交管道交涉此事，要求賠償道歉，但檯面下則策動小規模經濟抵制運動，形成壓力、以商逼政，藉此箝制英國的武力政策。

最後，如果從國際法的角度來重新檢視英國的軍事剿盜行動，也有相當可議之處。因為英國聲稱的海盜問題普遍管轄權，不過是一種抽象的國際法概念，並非行之有年的國際慣例。既然幾百年來連歐洲國家都甚少去實踐海盜問題的普遍管轄權，那為何英國在處理廣東海盜問題上，卻執意採取軍事行動，並以海盜罪的普遍管轄權為依據呢？同樣的情況如果發生在歐洲其他主權國家之間，即或發生海盜襲擊英船事件，除官方外交抗議交涉外，很難想像英國會以普遍管轄權為由，真的派遣海軍到海盜所屬之國去進行懲罰報復，甚至派兵登陸去燒毀村落。說穿了，英國不過利用抽象的國際法觀點，來合理化其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行為。這也是近代以來國際強權政治的實然面，強大的國家隨時可以使用國際法上任何的觀點，來掩飾其行動背後所牽涉到的侵害他國主權問題。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The Colonial Office, CO 129*)

- A Telegram from Commander-in-Chief, China Station, cited from Despatch from Miles Lampson,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to Austen Chamberlain, Foreign Office, London, 18 November 1927, *CO, 129/507/3*.
- Acting Consul-General Brenan to Sir M. Lampson, 17 November 1927, *CO, 129/507/3*.
- C. Clementi,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 to Major General C.C. Luard, General Officer Commanding Troops, South China Command, 7 May 1928, *CO, 129/507/3*.
- Cecil Clementi, Governor, Hong Kong to L.C.M.S. Amery, Colonial Office, 22 December 1927, *CO, 129/507/3*.
- From China," Mr. Brenan, Canton to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18 January 1928, *CO, 129/507/3*.
- J. F. Brenan, Acting Consul General, Canton to 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14 November 1927, *CO, 129/507/3*.
- J. F. Brenan, Acting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Miles Lampson, British Minister, Peking, 17 November 1927, *CO, 129/507/3*.
- Letter from Ch'en Cheong-lok,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Affairs, Canton, 10 November 1927, *CO, 129/507/3*.
- Letter from Chu Chao-hsin,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Affairs, Canton, 31 December 1927, *CO, 129/507/3*.
- List of losses incurred as the result of the burning of Taipinghu, etc., by British warships, *CO, 129/507/3*.
- Naval Intelligence Division, Naval Staff, Admiralty, *Confidential Admiralty Monthly Intelligence Report*, no.106, 15 March 1928, *CO, 129/507/3*.
- Notes of A Meeting at the Foreign Office on Wednesday, 18 January 1928, *CO, 129/507/3*.
- Report by A. Reynolds, Acting Chief Detective Inspector, Hong Kong, 28 December 1927, *CO, 129/507/3*.
- Report from A.L. Poland, Lieutenant Commander, Commanding Officer, HMS Robin to

the Commodore, Hong Kong & the Senior Naval Officer, West River, 11 November 1927, *CO*, 129/507/3.

(二) 英國內閣檔案(*The Cabinet Paper*, CAB)

Extract from the Minutes of the 219th Meeting,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se, 16 December 1926, *CAB*, 24/184:0006.

Governor,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30 June 1926, *CAB*, 24/181:0072.

Memorandum respecting Piracy Suppression received from Sir Miles Lampson, dispatch No. 1030, 21 September 1927, *CAB*, 24/202:0024.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sions of the Sunning Piracy Commission, *CAB*, 24/202:0024.

Report by the Chiefs of Staff Sub-Committee, 30 January 1929, *CAB*, 24/202:0024.

Report by the Chiefs of Staff, 9 December 1926, *CAB*, 24/184:0006.

(三) 英國外交部檔案(*The Foreign Office*, FO 371)

Cypher 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lonies to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22 December 1926, *FO*, 371/11671.

(四) 英國國會辯論檔案(*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Commons*, HC Deb)

Oral Answers, 14 November 1928, *HC Deb*, vol. 222, 857-859.

(五) 香港立法局文件 (*Sessional Papers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SP)

Despatch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H.M. Consul-General, Canton, 11 May 1927, *SP 1927*, no. 7, 172-174.

Despatch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H.M. Consul-General, Canton, 21 July 1927, *SP 1927*, no. 7, 179-180.

- Letter from H.M.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Canton, 25 July 1927, *SP 1927*, no. 7, 179-180.
- Letter from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Canton, to H.M. Consul-General, Canton, 29 July 1927, *SP 1927*, no. 7, 181.
- Note from H.M. Consul-General, Canton, to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Canton, 12 May 1927, *SP 1927*, no. 7, 172-174.
- Report of the Sunning Piracy Commission, 19 April 1927, *SP 1927*, no. 3, 57-69.
- Telegram from Butterfield and Swire S.S. Anking at Amoy (Captain Scott), 9 May 1927, *SP 1927*, no. 7, 173.
- Telegram from Mr. Eric Teichman, at Hankow, to H.M. Minister, Peking, 20 March 1927, *SP 1927*, no. 7, 172.

(六) 美國對外關係檔案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 The Charg'e in China (May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7 November 1927, *FRUS*, 1927, vol. 2, 331-333.
- The Minister in China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8 March 1927, *FRUS*, 1927, vol. 2, 269.

(七) 日本外務省外交檔案

- 〈外國側ニ於テ執リタル海賊取締ニ關スル強力手段ノ事例〉，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第二課資料，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一卷，F-0138/0139-0141。
- “Gaikoku gawa ni oite toritaru kaizoku torishimari ni kansuru kyōryoku shudan no jirei,” Nihon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Shina kaizoku kankei zakken*, dai 1 kan, F-0138/0139-0141.
- Memorandum by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23 September 192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一卷，F-0138/0145-0148。
- Memorandum by th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23 September 1927, Nihon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Shina kaizoku kankei zakken*, dai 1 kan, F-0138/0145-0148.
- Minutes of A Meeting to Discuss Anti-Piracy Measures, held at the Japanese Legation at

11:00 A.M., 16 November 192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一卷,F-0138/0180-0183。

Minutes of A Meeting to Discuss Anti-Piracy Measures, held at the Japanese Legation at 11:00 A.M., 16 November 1927, Nihon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Shina kaizoku kankei zakken*, dai 1 kan, F-0138/0180-0183.

Piracy in Chinese Waters, Circular 142, 21 September 192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一卷,F-0138/0149-0150。

Piracy in Chinese Waters, Circular 142, 21 September 1927, Nihon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Shina kaizoku kankei zakken*, dai 1 kan, F-0138/0149-0150.

日本海軍軍令部編,〈支那ニ於ケル海賊被害狀況一覽(大正10年以降昭和4年9月末調)〉,《軍令部常報第28號》,國情第6號,1929年10月25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支那海賊關係雜件》,第二卷,F-0139/0298-0304。

Nihon kaigun gunreibu, hen. “Shina ni okeru kaizoku haiga jōkyō ichiran (Taishō 10-nen ikō Shōwa 4-nen 9-gatsumatsu shirabe),” *Gunreibu jōhō dai 28 gō*, Kokujō dai 6 gō, 1929.10.25, Nihon gaimushō gaikō shiryō kan, zō, *Shina kaizoku kankei zakken*, dai 2 kan, F-0139/0298-0304.

(八)北京政府外交檔案(中研院近史所檔案藏)

外交部條約司譯件,〈中國南部之海盜(譯1924年4月15日《京津泰晤士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檔案》,館藏號03/46/029-29-002。

Wai jiao bu tiao yue si yi jian, “Zhong guo nan bu zhi hai dao (yi 1924.04.15 *Jing jin tai wu shi bao*),”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cang, Beijing zheng fu wai jiao dang an*, 03/46/029-29-002.

(九)國史館檔案

〈孫炳文等電蔣中正陳友仁等據報英派飛機士兵於稔山地區焚殺村民情勢危急已謀應付中(1927年3月2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12023。

“Sun Bingwen deng dian Jiang Zhongzheng chen you Rendeng ju bao ying pai fei ji shi bing yu ren shan di qu fen sha cun min qing shi wei ji yi mou ying fu zhong (1927.03.28),” *Guo shi guan cang,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wen wu, dian cang hao 002090103012023*.

〈黃鳴一電孫炳文轉蔣中正英兵二百餘人在會楊社山殺村戶二千餘家情形嚴重正謀對付(1927年3月2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11003。

“Huang Mingyi dian Sun Bingwen zhuan Jiang Zhongzheng ying bing er bai yu ren zai Huiyang Sheshan sha cun hu er qian yu jia qing xing yan zhong zheng mou dui fu (1927.03.27),” Guo shi guan cang, *Jiang Zhongzheng zong tong wen wu*, dian cang hao 002090103011003.

〈廣東省政府呈英國軍艦及飛機到惠陽縣屬稔山海面焚屋殺人造成慘案請嚴重交涉(1927年10月21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0553005。

“Guangdongsheng zheng fu cheng ying guo jun jian ji fei ji dao Huiyangxian shu Renshan hai mian fen wu sha ren zao cheng can an qing yan zhong jiao she (1927.10.21),” Guo shi guan cang, *Guo min zheng fu dang an*, dian cang hao 001070553005.

「英艦佈告一紙」，〈廣東省政府呈英國軍艦及飛機到惠陽縣屬稔山海面焚屋殺人造成慘案請嚴重交涉(1927年10月21日)〉，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典藏號001070553005。

“Ying jian bu gao yi zhi,” “Guangdongsheng zheng fu cheng ying guo jun jian ji fei ji dao Huiyangxian shu Renshan hai mian fen wu sha ren zao cheng can an qing yan zhong jiao she (1927.10.21),” Guo shi guan cang, *Guo min zheng fu dang an*, dian cang hao 001070553005.

(十) 英文《中國年鑑》(*The China Year Book*)

“A Note from Dr. C.C. Wu,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 Sir Miles Lampson, H.B.M. Minister,” December 1927, in H. G. 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 Book*, 1929-30,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12-1939.

“British Naval Raid,” (dates unknown) in H. G. 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 Book*, 1928,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12-1939.

“The An King Piracy,” (dates unknown) in H. G. 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 Book*, 1929-30,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12-1939.

“The Kochow Piracy,” 1 September 1927, in H. G. 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 Book*, 1928,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12-1939.

“The San Nam Hoi Piracy,” in H. G. 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 Book*, 1929-30,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12-1939.

“The Tean Piracy,” (dates unknown) in H. G. 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 Book*, 1929-30,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12-1939.

“The Yashing Piracy,” 1 September 1927, in H. G. W. Woodhead, ed., *The China Year Book*, 1928,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12-1939.

(十一) 英文報紙

“Action Against Chinese Pirates: British Expedition to Bias Bay,” *The Times*, 24 March 1927.

“An Occasional Note,” *The Strait Times*, 22 July 1927.

“Another Piracy: Jardine Cargo Steamer Seized,” *The China Mail*, 22 March 1927.

“Arms Seizure: Details of Haul on the Hopsang,” *The China Mail*, 24 March 1927.

“Attack on Bias Bay: Cantonese Force Raids Chinese Pirates,” *The Strait Times*, 29 January 1927.

“Bias Bay Captured,”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3 January 1927.

“Bias Bay Evil: British Navy Takes Drastic Action,” *The China Mail*, 24 March 1927.

“Bias Bay Raid: Five British Warships Take Part in Demonstration,” *The China Mail*, 2 September 1927.

“British Submarines to Rescue in Bias Bay,” *The Strait Times*, 21 October 1927.

“Hong Kong Clubs: Skippers Buy Off Pirate Chiefs,”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9 October 1929.

“Hopsang Piracy: Dutch Passenger Who Resisted, The Hai Nning Escape,” *The China Mail*, 23 March 1927.

“Plea for Strong Action,” *The Times*, 19 November 1926.

“Seang Bee Returns: Piracy Problem,”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9 February 1927.

“Tables Turned on Pirates: Further Details of Sunning Fight,” *The Strait Times*, 19 November 1926.

“Yatshing Piracy: Passengers Treated with Consideration,” *The China Mail*, 2 September 1927.

Times of Ceylon, 3 September 1927, cited from “Bias Bay: Ceylon Papers Comment on Raid,” *The China Mail*, 21 September 1927.

(十二) 中文報紙

- 〈十八師政治部之電報〉，《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26日，5版。
“Shi ba shi zheng zhi bu zhi dian bao,”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7.03.26, 5 ban.
- 〈日陞輪被海盜劫詳情〉，《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2日，第2張第2頁。
“Ri sheng lun bei hai dao qi jie xiang qing,” *Hong Kon ghua zi ri bao*, 1927.09.02, di 2 zhang di 2 ye.
- 〈外交部抗議英兵在拜亞士灣焚殺：提出嚴重抗議〉，《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28日，3版。
“Wai jiao bu kang yi ying bing zai Baiyashiwan fen sha: Ti chu yan zhong kang yi,”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7.03.28, 3 ban.
- 〈合生輪船軍火充公〉，《工商日報》(香港)，1927年3月31日，2版。
“He sheng lun chuan jun huo chong gong,” *Gong shang ri bao* (Hong Kong), 1927.03.31, 2 ban.
- 〈合生輪船員尚被扣留〉，《工商日報》(香港)，1927年3月26日，2版。
“He sheng lun chuan yuan shang bei kou liu,” *Gong shang ri bao* (Hong Kong), 1927.03.26, 2 ban.
- 〈合生輪船被劫〉，《工商日報》(香港)，1927年3月23日，2-3版。
“He sheng lun chuan bei jie,” *Gong shang ri bao* (Hong Kong), 1927.03.23, 2-3 ban.
- 〈合生輪船被劫後之所聞〉，《工商日報》(香港)，1927年3月28日，3版。
“He sheng lun chuan bei jie hou zhi suo wen,” *Gong shang ri bao* (Hong Kong), 1927.03.28, 3 ban.
- 〈合生輪船被劫續誌〉，《工商日報》(香港)，1927年3月24日，2版。
“He sheng lun chuan bei jie xu zhi,” *Gong shang ri bao* (Hong Kong), 1927.03.24, 2 ban.
- 〈兩處抵制英輪〉，《申報》(上海)，1927年9月17日，13版。
“Liang chu di zhi ying lun,” *Shen bao* (Shanghai), 1927.09.17, 13 ban.
- 〈政治工作人員與新聞記者聯席會議：發起反英屠殺稔山民眾示威大會〉，《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28日，4版。
“Zheng zhi gong zuo ren yuan yu xin wen ji zhe lian xi hui yi: Fa qi fan ying tu sha Renshan min zhong shi wei da hui,”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7.03.28, 4 ban.
- 〈英水兵痛剿大亞灣海盜〉，《工商日報》(香港)，1927年3月25日，3版。
“Ying shui bing tong jiao Dayawan hai dao,” *Gong shang ri bao* (Hong Kong),

1927.03.25, 3 ban.

〈英兵四千增防廣九路：稔山慘案…粵當局確於二十七日提出嚴重抗議〉，《世界日報》，1927年4月1日，3版。

“Ying bing si qian zeng fang guang jiu lu: Renshan can an ... yue dang ju que yu er shi qi ri ti chu yan zhong kang yi,” *Shi jie ri bao*, 1927.04.01, 3 ban.

〈英軍警會剿大鵬灣海賊〉，《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3日，第2張第3頁。

“Ying jun jing hui jiao Dapengwan hai zei,” *Hong Kong hua zi ri bao*, 1927.09.03, di 2 zhang di 3 ye.

〈英海軍焚燬盜村〉，《申報》(上海)，1927年9月3日，7版。

“ying hai jun fen hui dao cun,” *shen bao*, (shang hai), 1927nian 9yue 3ri, 7 ban.

〈英艦砲擊賊巢〉，《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5日，第2張第2頁。

“Ying jian pao ji zei chao,” *Hong Kong hua zi ri bao*, 1927.09.05, di 2 zhang di 2 ye.

〈英艦焚燬賊村房屋〉，《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6日，第2張第2頁。

“Ying jian fen hui zei cun fang wu,” *Hong Kong hua zi ri bao*, 1927.09.06, di 2 zhang di 2 ye.

〈香港支部反抗英兵越界焚殺稔山同胞宣言〉，《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4月4日，6版。

“Hong Kong zhi bu fan kang ying bing yue jie fen sha Renshan tong bao xuan yan,”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7.04.04, 6 ban.

〈香港英帝國主義水兵籍飛機在惠陽屬稔山地方大施屠殺〉，《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26日，5版。

“Hong Kong ying di guo zhu yi shui bing jie fei ji zai Huiyang shu Renshan di fang da shi tu sha,”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7.03.26, 5 ban.

〈香港英海軍痛剿海盜記〉，《申報》(上海)，1927年3月25日，6版。

“Hong Kong ying hai jun tong jiao hai dao ji,” *Shen bao* (Shanghai), 1927.03.25, 6 ban.

〈高州輪船停泊肇慶情形〉，《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24日，第3張第2頁。

“Gao zhou lun chuan ting bo Zhaoqing qing xing,” *Hong Kong hua zi ri bao*, 1927.09.24, di 3 zhang di 2 ye.

〈高州輪被劫之港訊〉，《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3日，第2張第2頁。

“Gao zhou lun bei jie zhi gang xun,” *Hong Kong hua zi ri bao*, 1927.09.03, di 2 zhang di 2 ye.

〈高州輪被劫情形續詳〉，《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5日，第2張第2頁。

“Gao zhou lun bei jie qing xing xu xiang,” *Hong Kong hua zi ri bao*, 1927.09.05, di

- 2 zhang di 2 ye.
- 〈惠州各界電告稔山慘案真相〉，《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31日，5版。
“Huizhou ge jie dian gao Renshan can an zhen xia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7.03.31, 5 ban.
- 〈惠陽縣長呈報稔山慘案詳情〉，《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4月2日，2版。
“Huiyang xian zhang cheng bao Renshan can an xiang qi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7.04.02, 2 ban.
- 〈港江航線加艦保護〉，《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9日，第2張第2頁。
“Gang jiang hang xian jia jian bao hu,” *Hong Kong hua zi ri bao*, 1927.09.09, di 2 zhang di 2 ye.
- 〈港督向粵政府抗議：反對中國軍隊在英界邊境組農民軍〉，《世界日報》，1927年2月15日，3版。
“Gang du xiang yue zheng fu kang yi: Fan dui zhong guo jun dui zai ying jie bian jing zu nong min jun,” *Shi jie ri bao*, 1927.02.15, 3 ban.
- 〈粵人對英兵放火之激昂〉，《民國日報》(上海)，1927年3月29日，4版。
“Yue ren dui ying bing fang huo zhi ji ang,” *Min guo ri bao* (Shanghai), 1927.03.29, 4 ban.
- 〈粵人對英艦炮擊比亞斯灣事件：示威〉，《世界日報》，1927年4月1日，3版。
“Yue ren dui ying jian pao ji Biyasiwan shi jian: Shi wei,” *Shi jie ri bao*, 1927.04.01, 3 ban.
- 〈實行派艦保護河道〉，《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24日，第3張第2頁。
“Shi xing pai jian bao hu he dao,” *Hong Kong hua zi ri bao*, 1927.09.24, di 3 zhang di 2 ye.
- 〈槍決勒收西江行水匪黨〉，《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24日，第3張第2頁。
“Qiang jue le shou Xijiang xing shui fei dang,” *Hong Kong hua zi ri bao*, 1927.09.24, di 3 zhang di 2 ye.
- 〈輪船不載肇慶貨客之原因〉，《香港華字日報》，1927年9月13日，第3張第2頁。
“Lun chuan bu zai Zhaoqing huo ke zhi yuan yin,” *Hong Kong hua zi ri bao*, 1927.09.13, di 3 zhang di 2 ye.
- 〈總政治部之緊急會議〉，《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26日，9版。
“Zong zheng zhi bu zhi jin ji hui yi,”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7.03.26, 9 ban.
- 〈總政治部通令宣傳英兵屠殺稔山民眾案〉，《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31日，6版。
“Zong zheng zhi bu tong ling xuan chuan ying bing tu sha Renshan min zhong an,”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7.03.31, 6 ban.

〈總政部今日招待新聞記者：討論英人又在惠陽慘殺案〉，《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28日，4版。

“Zong zheng bu jin ri zhao dai xin wen ji zhe: Tao lun ying ren you zai Huiyang can sha an,”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7.03.28, 4 ban.

〈獸兵出發時之耀武揚〉，《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26日，5版。

“Shou bing chu fa shi zhi yao wu ya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7.03.26, 5 ban.

〈獸兵登陸時之情形〉、〈施行大屠殺之慘狀〉，《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26日，5版。

“Shou bing deng lu shi zhi qing xing,” “Shi xing da tu sha zhi can zhuang,”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7.03.26, 5 ban.

趙慕儒，〈社論：我們要認識英帝國主義的屠殺政策〉，《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3月31日，2版。

Zhao, Muru. “She lun: Wo men yao ren shi ying di guo zhu yi de tu sha zheng ce,” *Guangzhou min guo ri bao*, 1927.03.31, 2 ban.

(十三) 專書、彙編、辭典、地方志

杭士基(Chomsky, Noam)著，李振昌譯，《海盜與皇帝——真實世界的新舊國際恐怖主義》(Pirates and Emperors, 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Real World)，臺北：立緒文化，2004。

Hangshiji (Chomsky, Noam), zhu, Li Zhenchang, yi. *Hai dao yu huang di: Zhen shi shi jie de xin jiu guo ji kong bu zhu yi (Pirates and Emperors, 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Real World)*, Taipei: Li xu wen hua, 2004.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Xu, Youchun, zhu bian. *Min guo ren wu da ci dian*, Shijiazhuang: Hebei ren min chu ban she, 199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Guo, Tingyi. *Jin dai zhong guo shi gang*, Hong Kong: Hong Kong zhong wen da xue chu ban she, 1989.

惠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惠東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03。

Huidongxian di fang zhi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Huidongxian zh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03。

惠頓(Henry Wheaton)原著，丁韞良譯，《萬國公法(*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北京：崇賓館，1864。

Huidun (Henry Wheaton), yuan zhu, Ding Weiliang, yi. *Wan guo gong fa (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Beijing: Chong bin guan, 1864.

黃月波等編，《中外條約彙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Huang, Yuepo, deng bian. *Zhong wai tiao yue hui bian*, Shanghai: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35.

廣東省惠陽地區地名委員會編，《廣東省惠陽地區名志》，惠陽：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87。

Guangdongsheng Huiyang di qu di ming wei yuan hui, bian. *Guangdongsheng Huiyang di qu ming zhi*, Huiyang: Guangdongsheng di tu chu ban she, 1987.

Fung, Edmund S. K.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 1924-1931*, Hong Kong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arkes O. and Maurice Prendergast ed., *Jane's Fighting Ships*,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1919.

(http://freepages.genealogy.rootsweb.ancestry.com/~pbtvc/Janes_1919/Index.html)

(Online Data)

(十四) 論文

呂芳上，〈北伐時期英國增兵上海與對華外交的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7期(臺北，1997.06)，頁187-229。

Lu, Fangshang. "Bei fa shi qi ying guo zeng bing shang hai yu dui hua wai jiao de yan bian,"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 kan*, di 27 qi (Taipei, 1997.06), 187-229.

李健民，〈民國十五年的四川萬縣慘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臺北，1990.06)，頁387-420。

Li, Jianmin. "Min guo shi wu nian de Sichuan Wanxian can an,"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 kan*, di 19 qi (Taipei, 1990.06), 387-420.

黃立、何田田，〈海盜罪的國際法規制〉，《太平洋學報》，2009年第9期(2009)，頁1-6。

Huang, Li, He Tiantian. "Hai dao zui de guo ji fa gui zhi," *Taipingyang xue bao*, 2009 nian di 9 qi (2009), 1-6.

應俊豪，〈1920年代列強對華砲艦外交的分析研究〉，收入《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外交》，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2。

Ying, Junhao, "1920 nian dai lie qiang dui hua pao jian wai jiao de fen xi yan jiu,"

- shou ru *Duo yuan shi ye xia de zhong hua min guo wai jiao*, Taipei: Guo li zheng zhi da xue ren wen zhong xin, 2012.
- 應俊豪，〈1920年代英國人眼中的廣東海盜問題〉，「2012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廈門：廈門大學中文系、廈門大學國學院、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2012年11月20-21日。
- Ying, Junhao. "1920 nian dai ying guo ren yan zhong de Guangdong hai dao wen ti," '2012 hai yang wen hua guo ji xue shu yan tao hui,' Xiamen: Xiamen da xue zhong wen xi, Xiamen da xue guo xue yuan, Guo li tai wan hai yang da xue hai yang wen hua yan jiu suo, 2012.11.20-21.
- 應俊豪，〈亟思反制：1920年代後期英國處理廣東海盜政策之轉向〉，收入周惠民主編，《國際秩序與中國外交的形塑》，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 Ying, Junhao, "Ji si fan zhi: 1920 nian dai hou qi ying guo chu li guang dong hai dao zheng ce zhi zhuan xiang," shou ru Zhou Huimin, zhu bian, *Guo ji zhi xu yu zhong guo wai jiao de xing su*, Taipei: Zheng da chu ban she, 2013.
- 應俊豪，〈英國與中國南北兩政府——北伐初期天津英租界國民黨人引渡案研究（1926）〉，《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12期（臺北，2007.09），頁61-84。
- Ying, Jun hao. "Ying guo yu zhong guo nan bei liang zheng fu: Bei fa chu qi tian jin ying zu jie guo min dang ren yin du an yan jiu (1926)," *Zhong hua jun shi xue hui hui kan*, di 12 qi (Taipei, 2007.09), 61-84.
- "United Nations Docu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Supplement to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1:4 (October 1947), 29-148.
- Azubuike, Lawrence. "International Law Regime against Piracy," Annual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15:1 (2009), 43-59.
- Hudson, Manley Ottmer. "The Progressive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4 (October 1926), 655-669.
- Kontorovich, Eugene. "The Piracy Analogy: Modern Universal Jurisdiction's Hollow Foundat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45:1 (Winter 2004), 183-238.
- Tang, Chi-hua. "Britain and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26-1928," London: Ph.D. dissert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91.

The British Naval Expeditions o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Kwangtung Pirates, 1927

Ying, Chun-hao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Oceanic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fter the 30 May Incident in 1925, Canton-British relations broke down, so any military cooperation regarding the suppression of piracy was not possible. However, the problem of the Kwangtung pirates was still unresolved, and became increasingly serious as the regular traffic and shipping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coastline was became under great threat.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hus proposed that Britain should undertake punitive action against the pirate bases. After a complicated process of debates over policy and interdepartmental confrontation, the British Cabinet finally approved the Governor's proposed military expedition. In 1927, the British armed forces in Hong Kong undertook three punitive strikes against the Kwangtung pirates by not only dispatching a fleet of carriers, cruisers, sloops and gunboats to demonstrate naval power, but also by landing troops on Chinese territory to burn down villages of the so-called pirates. But this hardline policy was soon proved to be a ridiculous one. Britain was making a display of its powerful gunboats only to deal with small groups of pirates who only possessed rifles and pistols. The result of the hardline policy was incredibly frustrating, as the pirates retreated from their bases, but never abandoned their business! They successively relocated to other areas and continued to commit piracy on the South China Sea, where many British steamers fell prey to them. When these punitive actions appeared to be unable to prevent the pirates from pillaging, Britain had no other option but to abandon them and attempt to devise other possible solutions.

In relation to this, the Canton authority (or Nationalist government) undertook a flexible, twofold approach to counteract the unilateral British military expeditions. One approach relied on domestic propaganda by labelling Britain's suppression of pirates and destruction of villages as "Imperialist Violence." This propaganda exaggerated the gravity of the event, overstated the casualties and losses, depicted it as a great "massacre", and moreover, employed anti-imperialist propaganda to evoke the indign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assist with the Nationalist Northern Expedition. The other approach was to formally launch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with Britain in order to claim compensation and extract an apology, yet simultaneously operate a small scale boycott against the Britain to aid with these negotiations.

In the end Britain's act of military vengeance was extremely controversial and problematic due to issues concerning complex treaty and international laws. Although based on treaties China was obliged to cooperate with Britain to suppress piracy on the Chinese coast, the treaties did not in fact authorize Britain to land its troops on Chinese territory to combat the pirates. Furthermore, while piracy was indeed an international crime, according to the usual practices of nations, active suppression of pirates was confined to be within the High Sea, and a nation's forces was not permitted to enter the territory of other states, both sea and land. In other words, even though the British shipping companies were victims of Chinese pirac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s still unable to undertake any military expedition within Chinese territory without prior consent from China, because otherwise this would be deemed as a viola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Keywords: Kwangtung Pirates, Bias Bay, British Navy, Anti-imperialistic Propaganda

